

《乾坤正氣集》與清中葉的纂修書籍風潮*

唐屹軒**

清初諸帝均甚為重視文化事業，入關前，便積極從事相關出版工作，入關後，更展開大規模圖書編纂工程，包含：文史地理、字典與百科全書式的大型套書，其中皆蘊含複雜的政治文化思想，影響力自不待言。時至嘉道年間，除例行的實錄、御製詩文集與聖訓等編纂工作外，官方大規模纂輯、刻印歷史文獻或詩文總集的文化事業已逐漸減少。然士人在文字獄的壓力下，仍積極纂修書籍，且蔚為大觀，形成一股風潮。嘉道年間正是王朝由盛轉衰的關鍵時刻，然士人如何回應時移世變？如何轉化學術風潮以經世濟民？凡此種種，至今均未明瞭其中曲折。是故，本文擬以顧沅、潘錫恩先後纂輯之兩部《乾坤正氣集》為核心，探討清中葉的纂修書籍風潮。同時，藉以探討清中葉士人的時代關懷焦點、士人網絡等，將有助於吾人進一步掌握清中葉學術文化脈動，捕捉時代風潮，並釐清學術

* 本文為科技部新進人員研究計畫案，「清中葉的纂修書籍風潮與士人網絡——以顧沅、潘錫恩與觀成為例」(MOST 106-2410-H-167-001)的部分研究成果。執行期間，獲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碩士生張亞軒、國立勤益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施宛莘等同學協助蒐集資料，特此感謝。初稿曾宣讀於「東亞近代史研究讀書會」，得到多位師友指正，獲益良多。其後，承蒙三位匿名審查者提供寶貴意見，並糾正文中多處舛誤和文字謬誤，謹此敬致謝悃。

**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基礎通識教育中心專案助理教授。
聯絡方式：41170臺中市太平區坪林里中山路二段57號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基礎通識教育中心
(No.57, Sec. 2, Zhongshan Rd., Taiping Dist., Taichung 41170, Taiwan [R.O.C.])。

與世變的密切關連。

關鍵詞：《乾坤正氣集》、清中葉、顧沅、潘錫恩、纂修書籍

一、前言

光緒二十九年(1903)，《國民日日報匯編》刊載一篇名為〈近四十年世風之變態〉的文章，內容縷述 1860 年代至 20 世紀初的世風演變。文中將此 40 年劃分為 6 個階段，每個階段選取一部風行於世的作品以為代表：《格致彙編》、葛士濬(1848-1895)輯《皇朝經世文續編》、《盛世危言》、《時務報》、《清議報》和《新民叢報》。該文說明所選作品的寓意，依序為：製造、洋務、時務、變法、保皇與立憲等。¹這 6 部作品能否準確代表 1860 年代至 20 世紀初的世風演變，容或有待商榷。但讀完該文後，令人不禁想深究，若將時序往前推移，嘉道年間(1796-1850)的代表作品又是哪部？其寓意為何？

眾所周知，清朝肇建伊始官方即積極從事圖書纂輯工作，重要目的之一係彰顯其作為傳統文化繼承者的正統性。其中，最具代表性和影響力的包括《全唐詩》、《御批歷代通鑑輯覽》與《四庫全書》，以及各式帝國戰勳、武功圖像等。²而在官方推行纂輯之際，亦伴隨著文字獄的高壓統治，這股強大壓力，帶給士人心中自我壓抑和自我審查的敏感意識。³孔飛力(Philip A. Kuhn, 1933-2016)便認為，賀長齡(1785-1848)和魏源(1794-1856)於道光六年(1826)出版的《皇朝經世文編》，因略有鼓勵士人關注政治之意，故仍潛藏著某些危險性。⁴

王汎森教授曾指出：禁書和明季遺獻復出乃道咸以降思想界的新現象。⁵然

¹ 佚名，〈近四十年世風之變態〉，《國民日日報匯編》，收入張枬、王忍之主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一卷（北京：三聯書店，1960），頁740-744。

² 相關討論，請參閱：葉高樹，《清朝前期的文化政策》（臺北：稻鄉出版社，2002）；有木大輔，〈曹寅の奏摺から見た御定『全唐詩』の成書過程〉，收入日本中国学会編，《日本中国学会報》，（東京：日本中国学会，2006），第58集，頁188-201；馬雅貞，《刻畫戰勳：清朝帝國武功的文化建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

³ 王汎森，〈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文獻中「自我壓抑」的現象〉，《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3），頁393-500。清代文字獄的相關研究，可參閱：郭成康、林鐵鈞，《清朝文字獄》（北京：群眾出版社，1990）；岡本さえ，《清代禁書の研究》（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6）；周宗奇，《清代文字獄》（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

⁴ 孔飛力(Philip A. Kuhn)著、陳兼、陳之宏譯，《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4），頁100。

⁵ 王汎森，〈道、咸以降思想界的新現象——禁書復出及其意義〉，《權力的毛細管

細察嘉道時期，不僅止於禁書與明季遺獻的復出，士人更積極蒐羅、編纂各式歷史文獻總集或詩文著作，書籍纂修蔚為一股風潮，如：王昶(1724-1806)編選《湖海詩傳》、《湖海文傳》；鐵保(1752-1824)纂輯《熙朝雅頌集》；嚴可均(1762-1843)編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朱珔(1769-1850)選輯《國朝古文彙鈔》；李祖陶(1776-1858)纂修《國朝文錄》；曾燠(1760-1831)輯錄《國朝駢體正宗》等。此外，尚有徐松(1781-1848)從《永樂大典》輯出《宋會要》、《宋中興禮書》和《中興禮書續編》等亡佚之書。《皇朝經世文編》的刊行尤為清中葉學術思潮的重要代表，其後，翻刻與續纂者所在多有，引發士人熱烈迴響。⁶

為何需要關注纂輯而成之總集文獻？不同於個人詩文別集，經編纂而成的總集除了集結多人著作外，更重要的是纂輯動機和歷程：為何編者會在這個時間點，選擇這些作品，從而纂輯成冊？每位作者在撰述文章時，均有其自身想法，而纂輯者在收錄文章時，則賦予該文章和纂輯之書新的意義，可能是強化其原本的意涵，抑或加以轉化，重新陳述一套新的思想。因此，纂輯的時間點、選擇或不選擇哪些作品，每一個動作，均代表編者嘗試傳達某些訊息。⁷正如劉苑如教授對葉德輝(1864-1927)的輯佚研究所論：從輯刻到出版，都透露了「微妙的時代消息」，而輯佚與編輯更是一種再創作，重新閱

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頁603-643。

⁶ 有關《皇朝經世文編》與「經世文編」編纂風潮等研究討論，可參閱劉廣京、周啟榮，〈《皇朝經世文編》關於經世之學的理论〉，收入劉廣京，《經世思想與新興企業》(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0)，頁77-186；黃克武，〈《皇朝經世文編》學術、治體部分思想之分析〉(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5)；龔來國，〈清「經世文編」研究——以編纂學為中心〉(上海：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04)；沈豔，〈晚清經世文編現象的歷史文化透視〉，《江漢論壇》，第1期(湖北，2000)，頁58-62；沈豔，〈晚清經世文編的文化特色與文化本質〉，《清史研究》，第1期(北京，2000)，頁69-74；沈豔，〈晚清獨特的文化景觀——經世文編的相與賡續〉，《孔孟學報》，第78期(臺北，2000.09)，頁321-344；沈豔，〈近代「經世文編」賡續潮流述論〉，《史學月刊》，第3期(河南，2004)，頁108-115；沈豔，〈試論近代續「經世文編」文化熱潮的成因〉，《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2卷第4期(湖北，2005.07)，頁489-492；李鵬程，〈晚清「經世文編」現象研究〉，《中州學刊》，第151期(河南，2006.01)，頁182-185。

⁷ 王汎森教授曾對此相關心境，有過詳細解析，參閱王汎森，〈「儒家文化的不安定層」——對「地方的近代史」的若干思考〉，《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7)，頁334-341。

讀與詮釋。⁸林曉光教授更透過比對張燮(1574-1640)《七十二家集》、張溥(1602-1641)《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與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輯錄之文，揭示：明清學者對漢魏六朝文本的纂輯，已發展出插入、拼合等特定處理手法，且帶有鮮明的個人思想與學術脈絡。⁹因此，我們更應認真看待纂輯而成之總集文獻，不僅閱讀收錄的文章內容，更需仔細檢視並解析編者隱藏的暗碼。

儘管自道光以降編纂經世文編甚為風行，但從士人言論可知，解決國家財政、胥吏冗員與將士疲弊等問題，並非纂修書籍的唯一目的，其背後尚有更核心的意涵。孫鼎臣(1819-1859)認為：「人心者，風俗之本也。風俗者，治亂之源也」，痛斥人心風俗流失陷溺，皆肇因於漢學之盛。¹⁰魯一同(1805-1863)更明言人心乃天下三大患之首，¹¹且「以為挽回世運莫切於文章，文章之根，本在忠孝，源在經術，其用在有剛直之氣，以起人心之痼疾，而振作一時之頑懦鄙薄，以復於古」。¹²略可說明士人將人心風俗厚薄、世運盛衰寄託於文章的想法，深信傳布文章可轉化風俗，振起世運。是故，嘉道時期士人纂修書籍的主題，大多緊扣時代脈動，富含深意。

明清鼎革後，忠義故事成為士人關注焦點，然如何講述？內容如何拿捏？仍需仔細琢磨。¹³如清初全祖望(1705-1755)藉由書寫南明忠義之士的碑志記傳，抒發其對忠義的看法，且「情深文明，其文能曲折盡情」，故影響深遠。¹⁴及至嘉道年間，以「正氣」為名之書，漸次浮現。嘉慶十(1805)年，浙

⁸ 劉苑如，〈從品鑑到借鑑——葉德輝輯刻《山公啟事》與閱讀〉，《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38期(臺北，2011.03)，頁171-213。

⁹ 林曉光，〈明清所編總集造成的漢魏六朝文本變異——拼接插入的處理手法及其方法論省思〉，《漢學研究》，第34卷第1期(臺北，2016.03)，頁309-355。

¹⁰ 孫鼎臣，〈論治一〉，《孫芝房侍講芻論》(咸豐十年五月刊于武昌節署，藏於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室)，卷1，頁1a-5a。

¹¹ 魯一同，〈覆潘四農丈書〉，收入魯一同著、郝潤華編校，《魯通甫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頁363-365。

¹² 魯一同，〈安徽候補知縣鄉賢潘先生行狀〉，收入魯一同著、郝潤華編校，《魯通甫集》，頁160-164。

¹³ 參閱何冠彪，《生與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擇》(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7)。

¹⁴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收入朱維錚校注，《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頁198。

江鄞縣士人董琅編有四卷本《甬東正氣集》，其目的乃在表彰明清鼎革之際，鄉先賢忠義殉節故事。¹⁵降至道光年間，顧沅(1799-1851)、潘錫恩(1787-1867)兩人先後於道光廿三年(1843)、道光廿八年(1848)纂輯二部《乾坤正氣集》，一為詩集一為文集。咸豐七年(1857)前後，尚有張應昌(1790-1874)輯錄本朝故事，編為《國朝詩正氣集》。是集同樣標舉忠孝節義精神，蒐羅逾萬首詩篇。¹⁶顯見以「正氣」為名之書，應具有特殊時代意涵，或許是探問清中葉纂修書籍風潮的線索之一。緣此，本文擬以顧沅、潘錫恩兩人先後纂輯之《乾坤正氣集》為例，探討士人纂修書籍的動機，藉以解析清中葉纂修書籍風潮與時代發展的脈動。此處所論之清中葉指涉的時代斷限係以嘉慶、道光兩朝為主，即嘉慶元年(1796)至道光三十年(1850)，然為求討論的連貫性，間或擴及乾隆晚年與咸豐初年。而有關書名部分，儘管顧、潘兩人纂輯之書皆名為《乾坤正氣集》，但依據顧沅在潘錫恩纂輯之《乾坤正氣集》的序言可知，刊行伊始顧沅將他纂輯之書訂名為《乾坤正氣詩集》，其後持續搜訪文集匯萃付刊，即為潘錫恩的《乾坤正氣文集》。¹⁷為免讀者淆惑，本文將延用此一稱呼，以示區別。唯綜合討論時，則以《乾坤正氣集》一名涵蓋詩、文集兩部著作，較為簡便。

二、顧沅與潘錫恩的傳略和網絡

(一)顧沅小傳

儘管顧沅聲名遠播，然與其相關的傳記資料卻寥若晨星，僅能從一些零碎的記述，拼湊其全貌。其中，潘錫恩撰述之〈湘舟顧君小傳〉提供吾人初

¹⁵ 董琅輯，《甬東正氣集》，收入王德毅主編，《叢書集成續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台1版）第119冊。

¹⁶ 張應昌，〈自題國朝詩正氣集此集稿本亂後已失〉，《彝壽軒詩鈔》，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1517冊，頁162。

¹⁷ 顧沅，〈序〉，收入潘錫恩輯，《乾坤正氣(文)集》（臺北：環球書局，1966）第1冊，頁1-2。

步線索，文中提及：顧沅，字澧蘭，號湘舟，自號滄浪漁父，江蘇長洲人，出身吳中望族，自幼聰穎，有過目成誦之譽，然不事舉業，不願通顯於世，選擇在鄉奉養祖父、母親等尊長。因受家學影響，顧沅致力蒐羅金石、抄錄校刊書籍，嘗於1826年纂輯5卷《聖廟祀典圖考》；道光七年(1827)刻印花費三年完成，多達246卷之《吳郡文編》；道光九年(1829)刊刻耗費四年而成的20卷《吳郡名賢圖傳贊》；道光十年(1830)亦先後刊印16卷《古聖賢像傳略》與《賜硯堂叢書》；1843年纂成20卷《乾坤正氣詩集》；道光廿九年(1849)則有24卷《今雨集》付梓。¹⁸編纂內容多以圖像傳略、詩文總集為主。道光二十年(1840)，顧沅在其住所營建園林，並取名為「辟疆小築」以紀念東晉遠祖顧辟疆，同時，在園中建有「藝海樓」庋藏從各地蒐羅的碑版、鼎彝、古錢等。孫燮(1783-1846)在《藝海樓藏書記》中縷述顧沅自幼立志蒐羅秘籍，見刻本、珍籍必購入庋藏，故藏品包含宋元舊刻書籍、碑刻、書畫等，乃至於近人之作均有收藏。且特許鄉人子弟願學者，皆得登樓縱觀所藏，以廣朝廷樂育之意。¹⁹此外，顧沅交遊廣闊，名重公卿，獲陶澍(1779-1839)、林則徐(1785-1850)等人器重，特與之訂交。緣此，其園林宅第內之牌匾多為官員、學者題寫，如「辟疆小築」由致仕在鄉的太子太保阮元(1764-1849)題寫，著名畫家嚴保庸(1799-1854)特撰《辟疆小築記》一文以資紀念；陶澍題「藝海樓」，由祁寯藻(1793-1866)書寫；姚元之(1783-1852)題書「吉金樂石之齋」；林則徐書並跋「傳硯堂」等。附近更有蘇軾(1037-1101)祠，遂為名流文宴聚會之所。另，顧沅效法范仲淹(989-1052)之志，捐田千畝以建義莊，救助貧困者。²⁰而顧沅最為人稱道之處則是其藏書之豐及熱衷纂刻書籍，楊鍾羲(1865-1940)嘗讚

¹⁸ 《今雨集》相關資料承蒙中央研究院王汎森院士賜知，復蒙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薛軼群協助蒐集相關資料，特此敬致謝悃。

¹⁹ 孫燮著，小成標點，《藝海樓藏書記》，收入蘇州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蘇州史志資料選輯第二十三輯》，
(http://www.dfzb.suzhou.gov.cn/database_books_detail.aspx?bid=3675)，2018年5月12日檢閱。

²⁰ 見潘錫恩，《湘舟顧君小傳》，收入顧沅輯，《吳郡文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第6冊，頁654-655；嚴保庸，《辟疆小築記》，收入顧沅輯，《今雨集》(道光己酉秋仲重編藝海樓藏版長洲顧氏開雕，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卷5，頁20a-22a；顧震濤，《吳門表隱》(上海：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頁155。潘錫恩，《顧氏義莊記》，收入顧沅輯，《今雨集》，卷5，頁18a-19a。

賞：「顧湘舟藝海樓藏書，不及《四庫》六百餘種，而《四庫》未收者二千餘種，亦吳下嗜古之巨擘也」。²¹《吳縣志》特別著錄顧沅「喜收藏宋元書籍及金石文字，築藝海樓儲之，圖書之富甲於東南……所交游多名流耆宿」。²²凡此種種，略可呈顯顧沅在時人及後人眼中，其藏書家、纂修書籍專家的鮮明形象。

(二)潘錫恩小傳

而為顧沅立傳、有志一同地纂輯《乾坤正氣集》的潘錫恩，雖官至江南河道總督兼漕運總督，晚年受封太子少保，死後入祀鄉賢祠，但與之相關的記述卻同樣稀少，就連潘錫恩本人亦未留下太多史料可供檢索，殊為可惜。藉由現存史料可知：潘錫恩，字芸閣，安徽涇縣人，嘉慶十六年(1811)，考中進士，同年有林則徐、李彥章(1794-1836)、程恩澤(1785-1837)、程喬采(1783-1858)等人。其後，潘錫恩選為庶吉士、授編修，旋擢為侍讀、侍讀學士。道光五年(1825)，派任為江蘇淮揚道，翌年實授副江南河道總督，至1829年，因丁母憂而去官。道光十二年(1832)，服闋後，授光祿寺卿，歷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順天學政、兵部、吏部右侍郎、吏部左侍郎等。道光廿二年(1842)，派任為江南河道總督，後兼署漕運總督，至1848年，以病乞歸。咸豐三年(1853)，銜命赴安徽太平府辦理捐輸團練事務、辦理安徽甯國府糧臺事務等。然咸豐八年(1858)，前江西巡撫張芾(1814-1858)參劾潘錫恩與程枚功、胡元熙等多人，皆係皖南著名巨富，卻是吝捐、抗捐的始作俑者，且咸豐五年(1855)，潘錫恩在籍督辦團防，臨警逃避，致使縣城失陷、糧臺餉銀軍火棄以資賊，至今仍逍遙事外，故奏請交部從重治罪。經審議後，遭革職嚴懲。²³直至同治三年(1864)，潘錫恩因捐京倉米折，得復原銜，並赴安徽廬州會辦勸捐守禦事。同治六年(1867)，病卒。翌年，潘錫恩的門生、漕運總督張之萬(1811-1897)疏陳

²¹ 楊鍾義著、雷恩海、姜朝暉校點，《雪橋詩話全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第3冊，頁2014。

²² 吳秀之等修、曹允源等纂，《江蘇省吳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頁1248。

²³ 張芾的奏折內容與上諭批示，見張芾，〈奏參抗捐巨紳摺〉，《張文毅公奏稿》（臺北：成文出版社，1968，台1版）第1冊，頁132-145。

潘之治河功績，獲賜祭葬，諡文慎，並入祀鄉賢祠，顯見政府高度肯定其對治理河患的貢獻。²⁴但除此之外，潘錫恩纂修書籍的事業亦不容輕忽，包括：道光三年(1823)，編撰 6 卷《畿輔水利四案》；1832 年，與黎世序(1772-1824)、俞正燮(1775-1840)等一同纂輯 156 卷的《續行水金鑑》；1842 年，協助穆彰阿(1782-1856)完成 560 卷《嘉慶重修大清一統志》；道光廿六年(1846)，在許瀚(1797-1866)、劉毓崧(1818-1867)、包慎言等人協助下，增訂畢沅(1730-1797)、謝啟昆(1737-1802)等人資助章學誠(1738-1801)撰述之《史籍考》，最終達 330 卷之多，然因太平軍興，無暇刊刻，原稿遂毀於戰火；²⁵1848 年，完成輯刊 574 卷的《乾坤正氣文集》。是故，除了實際治河工作外，潘錫恩也積極編纂水利相關書籍以為參考，並致力於各類文獻、詩文總集的纂輯、刊刻工作，著有成效。

(三) 士人網絡的連繫

顧沅、潘錫恩兩人活躍的年代主要是嘉慶、道光年間，故其交遊網絡、關懷核心自然與時代脈動息息相關。在顧沅編纂的各式文獻、詩文總集中，往往一書多序，序文作者多為顧沅師友故舊，或讚揚、認同其纂修之書的地方官員、知名文人等，故可藉以推知其交遊網絡。如《聖廟祀典圖考》由賀長齡、彭希鄭(1755-1822)、尤興詩(1760-?)等人寫序。其中，賀長齡係於 1826 年擔任江蘇布政使，由尤興詩推薦，特為《聖廟祀典圖考》題寫序文。而尤興詩與彭希鄭皆為顧沅同鄉。《吳郡名賢圖傳贊》則由梁章鉅(1775-1849)、湯金釗(1772-1856)、朱珩、韓對(?-1834)與陶澍等人撰寫序文。《吳郡文編》的序文則係朱珩、石韞玉(1756-1837)、梁章鉅與董國華(1800-1850)等人題寫。《乾坤正氣詩集》的序文有潘錫恩、王鏊(1786-1843)、陳鑾(1786-1839)、祁寯藻等

²⁴ 參閱〈禮部知照潘錫恩應予謚立傳咨文〉，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大清國史人物列傳及史館檔傳包傳稿目錄資料庫」，文獻編號：702001204-0-01；潘祥鶴，〈明代萬曆首輔大臣張居正，清代光緒軍機大臣張之萬〉，《江蘇潘氏宗親網》，(<http://www.jsfans.com/Catalog/719/2976>)，2018年7月21日檢閱。

²⁵ 林存陽，〈《史籍考》編纂始末辨析〉，《故宮博物院院刊》，第1期(北京，2006)，頁135-150。

人。《古聖賢像傳略》由吳廷琛(1773-1844)、屠倬(1781-1828)題寫序文。《賜硯堂叢書》則有蔣廷恩(1751-1822)、趙懷玉(1747-1823)、端木國瑚(1773-1837)、梁章鉅、石韞玉、陳鑾等人撰寫序文。其中，韓對、顧蕊係顧沅近親，²⁶而石韞玉、韓對、尤興詩和吳廷琛更直接參與《吳郡名賢圖傳贊》的校閱工作，故與顧沅時相往來，互動密切。其他，包括梁章鉅曾在 1823 年出任江蘇按察使兼署江南淮海河務道，1827 年又轉任江蘇布政使。朱珔自 1823 年起歷任鍾山、正誼、紫陽等書院之山長。陳鑾於 1825 年出任江蘇松江府知府，隔年轉任蘇州府知府，1832 年接任江蘇布政使，並接連署理江蘇按察使、江蘇巡撫等職。祁寯藻在道光十七年(1837)至道光十九年(1839)擔任江蘇學政。董國華、趙懷玉、蔣廷恩等人則與顧沅有同鄉之誼。由此可知，儘管顧沅並無顯赫功名，但其家族作為蘇州重要文化世家，且家中藏書豐富，自然大幅提升其知名度，並提供與官場名宦、著名學者交往的契機。

另，從顧沅纂輯之《今雨集》中，亦可梳理出其交遊網絡。因《今雨集》係輯錄顧沅與師友故舊的詩文唱和作品，以及各類書簡、顧沅編纂書籍之序跋題記等。書中所載多為顧沅師友酬答唱和之作，故可藉以追索顧沅的交遊網絡。如顧沅在 30、40 與 50 歲生日之際，蔣賡堦、蔣希曾、馮桂芬(1809-1874)、張肇辰、符葆森、陸長春、徐立方等多位友人，均有祝壽專文。壽文中莫不讚譽顧沅家學淵源、好古勤學，積極收藏珍本古籍、樂於結交文人名士，故名動公卿。此外，更設置義莊，賑濟窮困閉屨者；刊刻書籍，冀期激揚忠孝節氣，對社會貢獻良多。²⁷顧沅也熱衷參與師友故舊的雅集宴遊，以

²⁶ 顧蕊稱顧沅曾祖父顧濟美為「族祖」，而韓對、韓崧兄弟則稱顧濟美為「外伯祖」。因此，顧沅後人稱韓對與顧蕊乃顧沅近親。見顧蕊，〈題越州遺愛卷〉，收入顧沅輯，《今雨集》，卷7，頁10a-11a；韓崧，〈題越州遺愛卷〉，收入顧沅輯，《今雨集》，卷7，頁4a-4b；顧其威，〈顧沅編刻紀年表——為紀念顧沅誕辰二百周年而作〉，收入傳統文化研究會編，《傳統文化研究》（蘇州：古吳軒出版社，1999），第7輯，頁343-348，所引在頁347。

²⁷ 蔣賡堦，〈顧湘舟三十生辰序〉，收入顧沅輯，《今雨集》，卷3，頁20a-21a；蔣希曾，〈顧湘舟四十初度序〉，收入顧沅輯，《今雨集》，卷3，頁22a-22b；馮桂芬，〈顧湘舟五十壽序〉，收入顧沅輯，《今雨集》，卷3，頁23a-24b；張肇辰，〈顧湘舟五十壽序〉，收入顧沅輯，《今雨集》，卷3，頁25a-26b；符葆森，〈顧湘舟五十壽序〉，收入顧沅輯，《今雨集》，卷3，頁27a-28b；陸長春，〈顧湘舟五十壽序〉，收入顧沅輯，《今雨集》，卷3，頁29a-31a；徐立方，〈顧湘舟五十壽序〉，收入顧沅輯，《今雨集》，卷3，頁32a-33a。

及為蘇軾祝壽的紀念活動等，並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如道光十三年(1833)，顧沅參加江蘇常鎮道兼署按察使李彥章在官署發起之壽蘇活動，與會文人有陸我嵩(1789-1838)、鄭晴峰、楊文蓀(1782-1853)等人。²⁸道光十四年(1834)起，於蘇州定慧寺後方新建之蘇祠，即由顧沅負責管理，其後多年均有相關壽蘇、聚會活動。²⁹除了壽蘇活動外，崇祀韓世忠(1089-1151)也是另一個重頭戲。1830年，韓對與顧沅為重建傾圮之韓世忠祠墓，一同發起募捐，籌措所需之一千五百餘金，隔年即次第修復完成。³⁰其後，包括梁章鉅、陳鑾、朱珩、韓對、吳廷琛、彭蘊章、蔣賡堦等人，均有撰文題詩紀念此事。³¹倘若將參與雅集宴

²⁸ 見李彥章，〈道光癸巳十二月十九日以前所藏宋槧王注蘇集及坡公書致董侯真蹟在吳門泉廡之亦園招同陸萊莊鄭晴峰司馬楊芸士顧湘舟明經作蘇文忠公生日即用丙子年覃谿師見贈小齋祀公生日韻計已相距十八年矣〉，《蘇亭小志》(道光丁酉開雕長洲顧氏藏版，藏於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Harvard Yenching Library])，卷9，頁1a-1b；陸我嵩，〈道光癸巳十二月十九日李榕園廉訪招集小雪浪齋為蘇文忠公祀生日翌日遊定慧寺訪嘯軒故陞觀蘇公紹聖二年書歸去來辭石刻率成長句以貽顧湘舟明經〉，《蘇亭小志》，卷9，頁1b-2b。

²⁹ 見顧元愷，〈甲午夏日陸陳莊同年司馬來都以定慧訪碑圖屬題余已將乞假南省未暇題也九秋抵里司馬適以赴閩過蘇值家湘舟文學所闢嘯軒甫落成司馬用東坡詩韻賦八章首先唱始索余和余率筆應之臘月旬有五日余偕姪世駿過寺瞻謁越四日而同人釀飲為坡公壽湘舟來招余他事未能抽閒致闕禮拜因錄舊作〉，《蘇亭小志》，卷9，頁2b-3a；尤崧鎮，〈甲午冬日定慧寺蘇祠落成顧湘舟仁兄招集同人飲於嘯軒賦之〉，《蘇亭小志》，卷9，頁3b；石韞玉，〈吳城定慧寺舊有蘇文忠公所書淵明歸去來辭蓋寺僧卓契徒步深公於海南公感其誼書以贈之者今真蹟已亡僅存明時刻石道光甲午於寺後新建新祠頗具亭榭之勝顧子湘舟始終經理其事並於臘月十九日為公作生日詩以紀事〉，《蘇亭小志》，卷9，頁4b-5a；吳廷琛，〈定慧寺後新建蘇祠頗具亭榭之勝顧子湘舟始終經理其事並於臘月十九日為公作生日瞻拜之餘得詩二章〉，《蘇亭小志》，卷9，頁5a-5b；石韞玉，〈道光乙未十二月十九日立春雪霽溯景祐丙子蘇文忠公生日歷年八百同仁集新建蘇祠致祀賦詩紀事〉，收入顧沅輯，《今雨集》，卷13，頁8a。

³⁰ 韓對，〈韓忠武王祠墓志序〉，收入顧沅輯，《今雨集》，卷3，頁15a-15b；韓對，〈重修韓蕡王墓并建饗堂記〉，收入顧沅輯，《韓忠武王祠墓志》，收入吳平、張智主編，《中國祠墓志叢刊》(揚州：廣陵書社，2004)第46冊，頁143-147；郡人公撰，〈募捐修墓疏〉，《韓忠武王祠墓志》，頁149-150。

³¹ 梁章鉅，〈謁韓蕡王墓〉，《韓忠武王祠墓志》，頁166-168；陳鑾，〈謁韓忠武蕡王墓〉，《韓忠武王祠墓志》，頁168-169；朱珩，〈韓王修墓圖〉，《韓忠武王祠墓志》，頁169-170；韓對，〈謁韓蕡王墓歌〉，《韓忠武王祠墓志》，頁171-175；吳廷琛，〈讀韓蕡王碑〉，《韓忠武王祠墓志》，頁175-176；彭蘊章，〈題顧湘舟上舍訪韓碑圖〉，《韓忠武王祠墓志》，頁177；蔣賡堦，〈韓蕡王墓〉，《韓忠武王祠墓志》，頁177-178。

遊、名賢祝壽活動的士人，與為顧沅題寫序文的作者群兩相比照，即可發現兩者有著高度重疊性，顧沅的交遊網絡圖像已隱隱浮現。

若再進一步梳理顧、潘兩人交友圈，將發現有不少共同好友，其中扮演關鍵角色並與兩部《乾坤正氣集》的刊刻關係密切者，當以林則徐、姚瑩(1785-1853)兩人為主。

1. 林則徐

林則徐與潘錫恩係 1811 年辛未科同榜進士，誼屬同年，交情深厚自然不在話下。嘉慶十八年(1813)，時任翰林院庶吉士的林則徐在日記中，多處提及在寓中與諸同年讌集之事。嘉慶廿一年(1816)前半年，林則徐在京擔任編修，亦頻繁參與同年的雅集宴遊，據統計在此半年間即有 21 次的活動紀錄，期間更特別前往潘錫恩住處為其父親祝壽，顯見林、潘兩人交情匪淺。³²

1840 年，林則徐奉命前往廣州查辦鴉片後，特別致函潘錫恩，說明在廣東辦理禁烟的困難，並提出要注意英人北侵的可能性。同時，關切潘錫恩管轄的江南河道事務。信末，提及同年好友王雲錦、宋劭毅、楊希銓(1787-1855)等人近況。³³其後，林則徐遭道光帝(1782-1850)斥責「辦理不善」、未能妥善辦理廣東事件和軍務，且廢弛營務等，有負所託，予以革職並發往伊犁效力贖罪，以示嚴懲。³⁴道光廿四年(1844)，林則徐在伊犁時，寫信給潘錫恩，主旨係感謝為其發起贖緩之舉，並再三表達不敢違背遣戍之罪，故謝絕潘錫恩與諸友為其奔走、籌款之贖緩。³⁵

³² 參閱中山大學歷史系中國近代現代史教研組、研究室編，《林則徐集·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62)，頁18、19、25、29、38-49；來新夏編著，《林則徐年譜新編》(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7)，頁80。

³³ 見林則徐，〈致潘錫恩〉，收入楊國楨編，《林則徐書簡(增訂本)》(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頁100。另，在林則徐的日記中，亦可見與王雲錦、宋劭毅、楊希銓等同年頻繁的面談、聚餐活動。參閱中山大學歷史系中國近代現代史教研組、研究室編，《林則徐集·日記》，頁333-334、357、370、371。

³⁴ 〈廷寄三〉、〈廷寄〉，收入齊思和等整理，《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北京：中華書局，1964)第1冊，頁392、428-429；〈上諭〉，《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第2冊，頁1055-1056。

³⁵ 參閱林則徐，〈致潘錫恩〉，收入《林則徐全集》編輯委員會編，《林則徐全集·

此外，林則徐另有贈潘錫恩對聯，「三策治河書，緯武經文，求作江淮保障；一篇〈澄海賦〉，揆天藻地，蔚為華國文章」，讚賞潘錫恩在治河方面取得的高度成就。³⁶凡此種種，略可顯見，林、潘兩人的深厚情誼。

而有關顧沅與林則徐的連繫，在諸多顧沅相關傳略中均提及：因顧沅名重公卿，受林則徐器重，故特與之訂交。若推估林則徐的經歷，其與顧沅的交往應不會早於嘉慶廿五年(1820)，因林則徐自此開始派任為江南道監察御史，其後歷任浙江杭嘉湖道、江蘇淮海道、江蘇按察使並署理江寧布政使等職，且1832年至1837年，林則徐出任江蘇巡撫並兼署兩江總督，均多在江蘇一帶，故與顧沅應有所交往。其後，因獲罪遭遣，道光廿一年(1841)7月初，途經蘇州之際，顧沅特與林則徐見面，為其畫像留念。³⁷此外，林則徐亦與顧沅近親韓對、顧蕓等人皆有交誼，³⁸略可說明顧、林兩人應有一定交情。

2. 姚瑩

嘉慶十二年(1807)，姚瑩考中舉人，與潘錫恩為鄉試同年。轉年，聯捷進士，其同年有陳官俊(?-1849)、陶樸(1772-1857)、周之琦(1782-1862)、賀長齡、錢儀吉(1783-1850)等人。嘉慶二十年(1815)起，歷任福建、台灣、江蘇等地知縣。道光十一年(1831)，獲兩江總督陶澍、江蘇巡撫程祖洛(?-1848)推薦，姚瑩遂得引見，並奉旨發往江南協助處理水災善後事務。1832年，林則徐薦舉姚瑩補為長洲知縣，1834年，再獲林則徐、陶澍推薦，擢為高郵知州。道光十八年(1838)，派任為台灣兵備道，其後因遭逢鴉片戰爭，引發「殺俘冒功」事件，雖曾押解至北京審訊，但最終加恩獲釋，遂聲名大噪，與林則徐皆成

信札卷》(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2002)第7冊，頁391-392。與此同時，林則徐亦致函金安清、王蓮舟等人，感謝其贖緩之舉。見林則徐，〈致金安清〉、〈致王蓮舟〉，《林則徐全集·信札卷》第7冊，頁387-388、389。

³⁶ 方濬師撰、盛冬鈴點校，《蕉軒隨錄·續錄》(北京：中華書局，1995)，頁448。

³⁷ 見馮桂芬，〈林少穆督部師小像題辭〉，《顯志堂稿》，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1536冊，頁30。

³⁸ 見林則徐，〈和韓桂舫司馬(對)重游泮宮原韻〉，《林則徐全集·詩詞卷》第6冊，頁166。

為抗夷英雄。³⁹道光廿五年(1845)，姚瑩得知林則徐內召後，賦詩誌喜，顯見兩人交情，及其對林則徐的關懷。⁴⁰

從相關史料可知，1832年，姚瑩蒞任武進知縣，鄰近顧沅家鄉，故兩人應有機會相識。1837年，姚瑩在揚州重修史可法(1602-1645)之墓與祠宇，顧沅出借所藏史可法墨蹟。1838年，姚瑩赴任台灣兵備道之際，順道探訪顧沅，遂有纂輯《乾坤正氣集》之議。1843年，姚瑩因殺俘冒功事件從台灣押解回京，途經蘇州，與顧沅重逢，顧沅特為其畫像留念。1849年，顧沅不遠千里自蘇州來訪姚瑩，並出示所藏金石圖譜。姚瑩詢知《乾坤正氣集》即將付梓，喜不自勝，賦詩紀念。另，顧沅更將江淮名流女史為其祝壽之詩畫裝潢成冊，求詩於姚瑩。⁴¹凡此種種，略可說明顧、姚兩人的深厚情誼，及對《乾坤正氣集》的高度關切。而有關姚瑩與潘錫恩的交往，更直接影響《乾坤正氣集》的刊刻成敗。

緣此，顧沅、潘錫恩、林則徐、姚瑩四人，在士人網絡上產生了連繫，浸淫在同樣的時代氛圍，直接或間接催生了兩部《乾坤正氣集》的付梓，進而形塑、推動清中葉時代脈絡的發展趨勢。

三、《乾坤正氣集》的刊刻過程與內容

岡本さえ教授在有關清代禁書的研究中已指出：時至19世紀，禁書已然放鬆，惟漢人士大夫面臨十分荒涼的中國學術界，舉凡歷史、政治、科學或國際情報等出版物，幾乎消失殆盡。⁴²在此情況下，士人為解決當前社會

³⁹ 有關姚瑩在鴉片戰爭中的作為及其引發的迴響，可參閱唐屹軒，〈鴉片戰爭的和戰人物品藻與士人網絡〉，《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45期(臺北，2016.05)，頁73-79。

⁴⁰ 姚瑩，〈察木多歸次聞少穆舊帥以九卿召還喜而有作〉，《後湘續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549冊，頁692。

⁴¹ 姚瑩，〈僑寓白門僧舍顧湘舟自蘇州以其賜硯堂所藏金石圖譜來示且云家貯書十萬卷未入四庫目錄者二千可謂富矣詢知潘芸閣河帥刻乾坤正氣集將成欣然有作〉、〈顧湘舟五十歲江淮間名流女史壽以詩畫者甚眾湘舟裝潢成冊來索余詩〉，《後湘續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第549冊，頁707-708。

⁴² 岡本さえ，《清代禁書の研究》，頁573。

危機，不得不重新整理舊有思想資源，冀期成為解決弊端的指南，故纂輯文獻乃士人初步之努力。因此，1826年，賀長齡委託魏源編纂《皇朝經世文編》，翌年告成印行。《皇朝經世文編》收錄2,241篇文章，分為八大綱，共63項細目，總計120卷，可謂卷帙浩繁。但除此之外，更多學者投入的纂輯工作，係以詩文總集為主。清中葉之際，士人們莫不強調「人心者，風俗之本也。風俗者，治亂之源也」；⁴³「挽回世運莫切於文章，文章之根，本在忠孝，源在經術，其用在有剛直之氣，以起人心之痼疾，而振作一時之頑懦鄙薄，以復於古」。⁴⁴且正如朱琦(1803-1861)為符葆森纂輯《國朝正雅集》題序云：上自王公大臣，下至田間野老、羈人逸士，殆皆賦詩以達其性情，「其傳者或以專集或零章斷句，非哀而輯之則無以觀當時風尚，而極一代著作之盛」。⁴⁵緣此，透過解析《乾坤正氣集》的編纂、刊刻及其內容，或許能幫助吾人進一步掌握清中葉的時代發展脈動。

(一)《乾坤正氣集》的刊刻過程

纂輯、刊刻《乾坤正氣集》的重要推手，係顧沅、潘錫恩與姚瑩三人。顧沅因受家學影響，自幼即喜好蒐羅珍稀古籍，慨慕古人行誼，且有繼志述事之意，故自道光四年(1824)起廣泛搜羅、纂述、採訪故鄉吳郡歷代名賢，並於1829年刊行《吳郡名賢圖像贊》。其後，進而關注古來忠臣義士的著作，積極訪查各家後裔以獲取詩文全集，或從各處抄錄而得若干文字。雖有刊布以傳後世之心，但力有未逮，遲遲無法遂行。⁴⁶無獨有偶，姚瑩對「正氣」、「忠義」與「經世」等議題，亦頗為留意，並積極與師友交換意見。1813年，姚瑩在〈黃香石詩序〉中，便強調學詩必先師法其人品，如李白(701-762)、杜

⁴³ 孫鼎臣，〈論治一〉，《孫芝房侍講芻論》，卷1，頁1a-5a。

⁴⁴ 魯一同，〈覆潘四農丈書〉、〈安徽候補知縣鄉賢潘先生行狀〉，《魯通甫集》，頁363-365、160-164。

⁴⁵ 朱琦，〈序〉，收入符葆森編，《國朝正雅集》(清咸豐六年京師半畝園刊本，臺灣大學圖書館藏)，頁13a-14b。

⁴⁶ 顧沅，〈序〉，收入潘錫恩輯，《乾坤正氣(文)集》第1冊，頁1-2；顧沅，〈例言〉，收入顧沅輯，《賜硯堂叢書新編》(道光庚寅秋日長洲顧氏開雕，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頁1a。

甫(712-770)、白居易(772-846)、陸游(1125-1210)等雖以詩人之名震耀今古，卻非僅因其詩工而已，係因其人品，故詩文之中隱含「忠義之氣、仁孝之懷、堅貞之操」，遂得傳世不朽。⁴⁷1831年，在好友鄭開禧(1787-?)的詩序中，盛讚鄭開禧「憂時憫俗之心時露言表」，話鋒一轉，旋即指斥當今海內承平已久，故人心淫佚、蕩亂，當務之急唯有以詩歌持正人心、諷頌得失，方能拯濟黎元，導正風俗。⁴⁸1837年，姚瑩在給李兆洛(1769-1841)的信函中，直言「今天下所不足者氣節耳」。⁴⁹同年，更在揚州重修史可法之墓與祠堂，以資紀念。同時，為顧沅收藏的史可法墨寶，題寫書後，讚揚史可法真誠助人、忠義正直，使人心悅誠服。⁵⁰

1838年，姚瑩自江南啟程，赴任福建台灣兵備道，途經蘇州拜訪顧沅，見顧沅家中豐富藏書，且多為前代忠義諸公遺集，達數十種之多。是時，顧沅已刻印《史忠正集》，姚瑩遂囑託先行刊刻鄉先賢左光斗(1575-1625)的文集，並提議攜手合作，規劃纂輯詩文總集，內容起自屈原，下迄國初忠烈之士，取其殺身成仁有關社稷者，編為《乾坤正氣集》，藉以匡正世風，伸張正氣。1843年，姚瑩在蘇州與顧沅重逢，商討刊刻《乾坤正氣集》之事，姚瑩主動推薦鄉試同年潘錫恩，稱其個性「伉爽好義」，可與之籌議捐資助刊。⁵¹緣此，姚瑩先是致函潘錫恩，闡明《乾坤正氣集》乃「照膽之鏡」，能讓讀者的良心油然而生，有功於世，故刊行之事刻不容緩。原擬赴台籌資，然履任後，軍事迭興，無暇顧及，因此，希望潘錫恩出資協助。稍後，姚瑩繼續北上赴京候審，途經淮陰，更與潘錫恩面談，敦請資助三千金。潘錫恩聽聞後慨然允諾，並先行刊印顧沅主編之《乾坤正氣詩集》。其後，更在揚州設立書局，重金禮聘姚瑩推薦協助訪抄校刻之人，持續搜訪各家文集，除由文宗閣補鈔

⁴⁷ 姚瑩，〈黃香石詩序〉，《東溟外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1512冊，頁444-445。

⁴⁸ 姚瑩，〈鄭雲麓詩序〉，《東溟外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1512冊，頁445。

⁴⁹ 姚瑩該信，見蔣彤編，《李申耆(兆洛)年譜》（臺北：文海出版社，1969），頁175-176。

⁵⁰ 姚瑩，〈史忠正公與戚屬書書後〉，《東溟文後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1512冊，頁577。

⁵¹ 顧沅，〈序〉，收入潘錫恩輯，《乾坤正氣(文)集》第1冊，頁1-2。

未經列入者，潘錫恩更與顧沅昕夕討論，命其廣加蒐羅、采訪校讐，並在陳彬華、陳文保父子協助校理下，終於在 1848 年完成《乾坤正氣文集》的編纂工作。⁵²

據吳坤修(1816-1872)所述，潘錫恩在《乾坤正氣文集》鏤板告成後，即謝病歸里，其後因戰亂未及印行，藏於家中的書板竟奇蹟躲過戰火，幸存無恙。直至同治四年(1865)，潘錫恩四子潘駿德(1838-?)出示書板，始由吳坤修集資刷印 100 部，以傳布海內。序文中亦提及顧沅纂輯之《乾坤正氣詩集》，然因蘇州近年疊遭兵燹，未知該書存否。同治六年(1867)，吳坤修覓得《乾坤正氣詩集》書板，旋即出資刊刻，並撰序強調：「天下所恃者惟人心，人心所重者惟忠義」，故重刻《乾坤正氣詩集》以扶植世教，俾使詩文兩集並行海內毋得偏廢，「諸賢精忠大節與日月爭光者，從此昭垂於天壤間」。⁵³值得措意的是琦善(1786-1854)之子恭鎰，曾在光緒七年(1881)再次翻刻印行《乾坤正氣文集》。恭鎰曾略述因緣：其一，潘錫恩係出於琦善門下。其二，同治十年(1871)至同治十三年(1874)，恭鎰擔任工部員外郎，結識潘錫恩諸子潘駿文(?-1893)、潘駿猷、潘駿德等人，始知《乾坤正氣文集》一書。光緒四年(1878)，調任為安徽寧池太廣道，結識潘錫恩從子潘蘊藻(1834-1888)，⁵⁴詢知書板藏於家中。緣此，因與潘錫恩父子兩代關係深厚，且距吳坤修刊印已逾十餘年，「見正氣之不可或息於兩間」，故有重刻之舉。⁵⁵

由此可知，《乾坤正氣集》的問世，有賴於顧沅家中庋藏的前明忠義諸公遺集，加上姚瑩居中協調、費心奔走，即便在奉逮入都途中，仍心繫詩文

⁵² 姚瑩，〈與潘河帥書〉、〈謝陳子農送重刻遜志齋集書〉、〈史忠正公與戚屬書書後〉、〈忠毅公家書真蹟書後〉，《東溟文後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1512冊，頁553-554、558-559、577、580-581；潘錫恩，〈序〉，收入潘錫恩輯，《乾坤正氣(文)集》第1冊，頁3-5；潘錫恩，〈序〉，收入顧沅輯，《乾坤正氣(詩)集》(道光癸卯秋日長洲顧氏藝海樓雕，國家圖書館藏)，頁1a-2a。

⁵³ 吳坤修，〈跋〉，收入潘錫恩輯，《乾坤正氣(文)集》，頁7；吳坤修，〈重刊顧刻乾坤正氣集序〉，收入顧沅輯《乾坤正氣(詩)集》(清同治六年新建吳氏皖城刊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頁1a-1b。

⁵⁴ 有關潘錫恩與潘蘊藻關係的考訂，請參閱陸林，〈清代文言小說家潘綸恩生卒定考〉，《明清小說研究》，第4期(南京，2002)，頁177-179。

⁵⁵ 恭鎰，〈序〉，收入潘錫恩輯，《乾坤正氣(文)集》，頁9-12。

集刊布之事。其後，仍時常掛心，在與友人書函中，亦表露關切詩文集付梓與否之意。⁵⁶這與姚瑩因殺俘冒功事件遭押解入京受審的境遇不無關連，略有藉此表明心跡，澆自己胸中之塊壘。當然，地方大員潘錫恩、吳坤修、甚或恭鎰等人急公好義，協助詩文集的搜訪、刊刻工作，以及後續募捐集資，甚或慷慨解囊也至關重要。因此，在眾人通力合作下，成功完成纂輯刊刻《乾坤正氣集》。

(二)《乾坤正氣集》的內容

在纂輯《乾坤正氣集》之前，姚瑩、顧沅等人即對忠義、正氣等議題頗為關注，且已注意到因承平日久，士人普遍缺乏忠義之心，為扭轉世風、改正士習，遂致力以各種方式進行倡導，冀期振起忠義之氣，其中亦包含纂修書籍一途。姚、顧、潘等三人在多處場合，無不再三強調《乾坤正氣集》的含義及其重要性，如在 1846 年，兩部《乾坤正氣集》刊刻完成之間，姚瑩覆書答謝友人陳息凡致贈重刻方孝儒(1357-1402)《遜志齋集》時，提及：清朝刻印書籍數量遠邁前代，且人才、學問和文章皆極盛，惟在上位者未能提倡振作，士人埋首科舉利祿，故獨缺氣節之士。為今之計，當以編纂前代忠孝氣節人物之生平事業與詩文作品，大量印行宣傳，使人人得以閱讀，受其啟發。⁵⁷其後，再三強調「是集也其人皆忠孝節義，身際艱難不貪富貴，殺身成仁，見其事咨嗟而涕泗，聞其風感奮而與起，世之娼嫉姦佞諂諛苟且陰狠詐偽者流對之泚然內媿，可潛消其邪慝之心，邪心消則其氣沮，正氣自申，而綱常名孝可扶，乾坤定矣」。⁵⁸顧沅亦確信纂輯《乾坤正氣集》，乃「激揚忠孝，表章湮沒，用申景慕，昭示來茲」的當為之舉。⁵⁹

1843 年，由顧沅纂輯的《乾坤正氣詩集》，共收錄 318 位歷代士人詩集，

⁵⁶ 姚瑩，〈謝陳子農送重刻遜志齋集書〉，《東溟文後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1512冊，頁558-559。

⁵⁷ 姚瑩，〈謝陳子農送重刻遜志齋集書〉，《東溟文後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1512冊，頁558-559。

⁵⁸ 姚瑩，〈與潘河帥書〉，《東溟文後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1512冊，頁553-554。

⁵⁹ 張肇辰，〈顧湘舟五十壽序〉，收入顧沅輯，《今雨集》，卷3，頁25a-26b。

其中明代士人以 208 位，占大多數。1848 年，由潘錫恩主持編纂的《乾坤正氣文集》，則收錄了 101 位歷代士人的文集，其中仍以 72 位明代士人為數最多。顯見姚、顧、潘三人有意以明代士人的忠義故事為主軸，冀期達成重新振作士習的目的。而明代士人忠義故事的內容，便涉及明清鼎革之際的抗清活動。何以姚、顧、潘等三人，選在此時編纂以明代士人忠義故事為主的詩文總集？

眾所周知，清初以降對前明政權、忠明士人採取負面、詆毀的評價，相較於此，卻肯定貳臣、降清之士對清朝的貢獻，康雍乾時期的《明史》修纂、以及張煌言(1620-1664)形象的轉變等均為顯例。⁶⁰直到乾隆四十一年(1776)乾隆帝(1711-1799)下令纂修《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官方態度出現明顯變化。《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的成書背景係起於乾隆卅一年(1766)，乾隆帝因不滿國史館進呈之洪承疇(1593-1665)傳記，便發布上諭，強調嗣後毋需視南明政權為僭偽，亦不應視南明諸臣的抗清言行為叛逆。⁶¹這道諭旨標示了乾隆帝將重新審視明清鼎革之際的歷史及其相關人物評價。緣此，自乾隆四十年(1775)起，乾隆帝下令為表彰南明諸臣殉節之事，並給予諡號，由舒赫德(1710-1777)、于敏中(1714-1779)等人負責纂輯《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在乾隆帝意旨下，《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針對明代 3,746 位士人進行重估，包括靖難之變、甲申事變殉節士人，重新給予歷史評價，賜予諡號，其高下依序為：個人專諡、通諡忠烈、忠節、烈愍、節愍，與入祀忠義祠等。

但正如陳永明教授所論，《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中有 128 位係死於靖難之中，而在甲申事變前殉節者有 448 位，甲申事變之際為 288 位，南明抗清時死事者有 770 位，但死於地方民變者卻高達 2,112 位。即便是抗清而亡

⁶⁰ 相關研究討論，請參閱喬治忠，《清朝官方史學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何冠彪，〈清高宗對南明歷史地位的處理〉，《新史學》，第7卷第1期(臺北，1996.03)，頁1-27；何冠彪，〈順治朝《明史》編纂考〉，《大陸雜誌》，第99卷第2期(臺北，1999.08)，頁1-22；喬治忠，〈論清順治朝與康熙朝初期對《明史》的纂修——兼與香港大學何冠彪博士商榷〉，《河北學刊》，第23卷第3期(河北，2003.05)，頁145-151；陳永明，《從逆寇到民族英雄：清代張煌言形象的轉變》(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7)。

⁶¹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朝上諭檔》(北京：檔案出版社，1991)第4冊，頁896-897；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第18冊，頁373。

的士人，對其殉節過程亦略而不談，相較於詳實呈現死於地方民變士人的英勇事蹟、從容態度，以及匪賊凶殘行徑等有著明顯差異，顯見清朝官方刻意淡化抗清死節士人的色彩。故陳永明教授認為即便乾隆帝下令纂輯《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卻非代表清朝開放抗清歷史的記憶，而是將之置於政治實效、道德教化之下，以清朝官方的脈絡，再現抗清士人的言行。且《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與《四庫全書》的編纂時間相近，係清代採行「寓禁於編」的高峰期，即名為徵集、編纂，實為查禁、銷毀書籍。故《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雖一方面重估抗清士人的歷史地位，卻也同時查禁士人著述，即便其人獲得官方肯定，但詩文著述依舊禁止傳布。⁶²

仔細檢閱《乾坤正氣集》收錄的明代士人名單即可發現，姚、顧、潘等三人大抵遵循乾隆帝在 1776 年《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劃下的紅線，減少逾越。在《乾坤正氣集》收錄的明代士人名單中，扣除詩文集著作均有收錄的 58 位，共計 222 位。其中，清朝未給予諡號者僅 77 人，部分是未有功名的諸生，故不論明、清二代均未予諡號。其餘的 145 位，有 129 位均在《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獲得重新評述。儘管如此，但在《乾坤正氣文集》選錄的 72 位明人中，有 33 人的著作曾被列為禁書，其中有 17 部作品的現存版本係出自《乾坤正氣文集》，⁶³或可說明姚、顧、潘三人在此時代風潮下，藉由輯錄前明士人文集，大力提倡忠義、正氣之風，同時也將清中葉的忠義、正氣風潮推向另一個高峰。

四、正氣、忠義與清中葉的時代風貌

綜上所述可知，《乾坤正氣集》乃清中葉纂修書籍風潮下的重要代表作品之一，也是時代脈動的重要表徵，藉此或能一窺士人詩文救國的態度，呈顯嘉道咸年間的時代風貌，以及士人時代關懷的焦點。

⁶² 陳永明，〈《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與乾隆對南明殉國者的表彰〉、〈《貳臣傳》、《逆臣傳》與乾隆對降清明臣的貶斥〉，收入陳永明，《清代前期的政治認同與歷史書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頁183-259。

⁶³ 相關資料，見岡本さえ，〈卷末付表1：禁書著者一覽表〉、〈卷末付表2：禁書名一覽表〉，《清代禁書の研究》，頁578-734。

(一)「正氣」的風潮

隨著時序進入道光年間，迥異於傳統夷夏之防的問題漸次浮出檯面，尤其在 1840 年鴉片戰爭爆發後，更加激起士人仇外抗敵之心。緣此，士人開始思考如何提振士氣，轉化劣勢，正氣、忠義遂成為士人關注的焦點，並迅速蔚為一股風潮。標舉、崇尚先賢，便具有重要象徵意義，同時，進一步修建祠墓，邀集師友一同祭祀，更是以具體行動傳達重要時代訊息。如道光二年(1822)，林則徐便倡議集資整修于謙(1398-1457)祠墓，在〈重修于忠肅公祠墓記〉中，特別說明修治于謙祠墓係有助於扶植人心綱常，且將于謙與岳飛(1103-1142)、文天祥(1236-1283)相提並論，並以此三人自勉。⁶⁴于謙、岳飛、文天祥等三人的歷史評價經常與「正氣」劃上等號，且乾隆帝也多次予以褒獎，如乾隆十六年(1751)南巡之際，乾隆帝特為于謙題寫「丹心抗節」、為岳飛題寫「偉列純忠」等匾額，⁶⁵略可說明官方的態度。林則徐特別標舉于、岳、文三位名賢，並言明希冀效法，其寓意可想而知。此外，姚瑩也是動作頻頻，1837 年，在淮南鹽運使任上，重修史可法的墳墓及祠宇。⁶⁶翌年，姚瑩因赴任福建台灣兵備道，途經蘇州拜訪顧沅，便提議攜手合作，規劃纂輯詩文總集，藉以宣揚忠義正氣之風。

另，在師友故舊聚會的場合中，透過傳觀具有重要象徵意涵人物的珍貴書札、遺墨，亦傳達出特定訊息，且有凝聚並強化眾人心緒的作用。如 1837 年，姚瑩在揚州重修史可法之墓與祠宇，顧沅出借所藏史可法墨蹟。⁶⁷1839 年 4 月，沈兆澐(1784-1877)拜訪顧沅時，顧沅拿出范景文(1587-1644)、申佳胤(1603-1644)兩人墨寶，雖僅 264 與 46 字，但已讓沈兆澐對其行誼肅然起敬。⁶⁸同

⁶⁴ 林則徐，〈重修于忠肅公祠墓記〉，《雲左山房文鈔》，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548冊，頁734-735。

⁶⁵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六)》第14冊，頁34。

⁶⁶ 姚瑩，〈史忠正公與戚屬書書後〉，《東溟文後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1512冊，頁577。

⁶⁷ 姚瑩，〈跋史忠正手劄後〉，收入顧沅輯，《今雨集》，卷9，頁13a-13b。

⁶⁸ 沈兆澐，〈跋刻范忠文申忠愍兩劄後〉，收入顧沅輯，《今雨集》，卷9，頁14a。沈兆澐該文僅書「范忠文」，然遍查相關資料，未見明清兩代有范姓士人諡號為「忠

年中秋，顧沅過訪范仕義(1785-1865)、黃春澗、黃楚橋、施益三等好友，特別攜帶盧象升(1600-1638)遺墨，相與諦觀，諸人莫不讚歎其忠義之氣。⁶⁹凡此種種，略可呈顯在 1840 年鴉片戰爭爆發前，士人已密切關注「忠義」和「正氣」等相關議題，並藉由各種方式推動、宣揚「正氣」的風潮。

1840 年起，這波倡議「正氣」的風潮，在鴉片戰爭影響下，愈漸熱鬧，且逐步攀上高峰。不少官員在抗英戰爭中，英勇犧牲，成為士人宣揚的實際例證。許多士人紛紛為死節之士題寫詩文，以紀念、宣揚其為國犧牲的忠義之舉。1841 年，英軍猛攻定海，定海總兵葛雲飛(1789-1841)、處州鎮總兵鄭國鴻(1777-1841)與壽春鎮總兵王錫朋(1786-1841)，以四千名兵力抵抗英軍二萬餘人，經過六晝夜血戰，始終未獲兵援，奮戰而亡。因死傷慘烈，故朝廷恩准三人入祀昭忠祠，且在定海建專祠合祀三人，三人原籍亦准許建祠奉祀。⁷⁰葛雲飛歸葬故里後，宗稷辰(1788-1867)為其撰行狀，邵懿辰(1810-1861)書墓表，王拯(1815-1876)寫墓誌銘，其子葛以簡、葛以敦為父刊刻年譜，以存史事。⁷¹朱琦縷述定海三鎮失陷過程，哀悼王錫朋死狀尤為慘烈。⁷²王拯追記王錫朋死難事績，以表彰其忠勇愛國之心。⁷³許棫(1799-1881)和陸嵩(1791-1860)賦詩並陳三人血戰故事，與痛失將才的悲嘆。⁷⁴

奮勇捐軀的陳化成(1776-1842)，尤為士人賦詩頌揚對象。1842 年，陳化

文」者，唯清代追諡范景文「文忠」。另，宋代名臣范鎮(1007-1088)諡號為「忠文」，然范鎮與沈兆澧該文脈絡不甚相符，故此處暫以范景文視之。

⁶⁹ 范仕義，〈跋盧忠肅軍中七夕歌卷〉，收入顧沅輯，《今雨集》，卷9，頁11a；蔡世松，〈跋刻盧忠肅軍中七夕歌卷〉，收入顧沅輯，《今雨集》，卷9，頁12a。

⁷⁰ 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第38冊，頁11531-11534。

⁷¹ 葛以簡、葛以敦編，《凌臺府君年譜》，收入北京圖書館編，《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第143冊，頁87-207。

⁷² 朱琦，〈王剛節公家傳書後〉，《怡志堂詩初編》，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1530冊，頁161。

⁷³ 王拯，〈王剛節公家傳跋尾〉，《龍壁山房文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659冊，頁541-542。

⁷⁴ 許棫，〈塵舟山并敘〉，《東夫山堂詩選》，收入文清閣編，《稀見清人別集百種》(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第17冊，頁346-348；陸嵩，〈定海陷賊鎮將葛雲飛壽春鎮王錫朋處州鎮鄭國鴻俱力戰死王公尸未得歸其死尤慘〉，《意苕山館詩稿》，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570冊，頁619。

成在炮戰中遭落彈擊中，失血過多而亡。吳淞人民旋即作詩成帙，題曰《表忠崇義集》，王樹滋特撰〈殉節始末記〉誌之，文中誦贊陳化成捨身取義，雖遭同僚掣肘，仍盡忠報國，死而後已。⁷⁵士人悲痛於陳化成的死難，紛紛賦詩寫詞記述功蹟，繪像存人。如張金鏞(1805-1860)撰寫輓辭哀悼；⁷⁶金和(1818-1885)、王燾與陸嵩等人均在詩中標舉陳化成不願棄城而逃，堅守到底的壯烈行為。⁷⁷嘉定縣令練廷璜在陳化成死難三週內，命人繪製圖像，並徵集詩作，以資紀念。其後，蘇廷玉(1783-1853)邀請張際亮(1799-1843)為練廷璜收藏之圖像撰述〈陳忠愍公死事詩〉。張際亮在詩中頌揚陳化成的禦敵事蹟與帶兵方法，抨擊舉國畏戰、求和的消極態度，並以南宋故事為例，說明和談的悲慘後果。⁷⁸何紹基亦為陳化成遺像題詩，盛讚其英勇事蹟與愛國熱忱。⁷⁹陳慶鏞(1795-1858)頌揚其以一擋十，力抗不屈的態度；⁸⁰王拯詳述陳化成堅守吳淞，令夷敵不敢冒進，以及開戰後奮勇禦敵的身影。並說明畫像之由來，乃嘉定縣令練廷璜募得陳化成遺體，命人為其繪製遺像。文末慨嘆陳化成之勇猛，吳淞陷落後，江南危矣，朝廷採撫夷之策，令人不勝唏噓。⁸¹

此外，最關鍵的還有被奉為主戰英雄之林則徐、姚瑩，透過與家人、師友頻繁的魚雁往返，以及師友宴集聚會、詩文酬答等機會，反覆宣揚主戰立場，以及他們對當前政局看法、戰爭中的作為和判斷等。士人網絡正以傳閱、

⁷⁵ 陸以湉撰、崔凡芝點校，《冷廬雜識》(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351-352。

⁷⁶ 張金鏞，〈江南提督陳公化成輓辭〉，《躬厚堂詩錄》，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618冊，頁10。

⁷⁷ 金和，〈陳忠愍公死事詩〉，《來雲閣詩》，收入阿英編，《鴉片戰爭文學集》(北京：古籍出版社，1957)上冊，頁41；王燾，〈弔陳元戎化成〉，《對山樓詩稿》，收入阿英編，《鴉片戰爭文學集》上冊，頁92；陸嵩，〈悲吳淞為陳將軍化成作〉，《意苕山館詩稿》，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第570冊，頁621-622。

⁷⁸ 張際亮，〈陳忠愍公死事詩〉，收入張際亮著、王颺校點，《思伯子堂詩文集》下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頁1268-1269。

⁷⁹ 何紹基，〈題陳忠愍公化成遺像練粟人屬作〉，收入何紹基撰、龍震球、何書置校點，《何紹基詩文集》(長沙：岳麓書社，2008)第1冊，頁153。

⁸⁰ 陳慶鏞，〈陳忠愍公化成遺像〉，《籀經堂類藁》，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1522冊，頁607。

⁸¹ 王拯，〈陳將軍畫像記〉，《龍壁山房文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659冊，頁520。

抄錄的方式，散播鴉片戰爭中以林則徐、姚瑩等人為首的鷹派立場之相關情報。⁸²是故，「正氣」的風潮開始在士人網絡中逐漸發酵，並成為士人詩文救國、提振士氣的關鍵詞。

1841年，英夷侵擾定海、吳淞江，葛雲飛(1789-1841)與楊慶恩先後死節，宗稷辰於宣武門外建「正氣閣」，崇祀倪元璐(1593-1644)、施邦曜(1585-1644)與周鳳翔(?-1644)等11名前明忠義志士，並同祀葛雲飛與楊慶恩。翌年春天，宗稷辰邀集陳慶鏞、梅曾亮(1786-1856)、朱琦、何紹基、孫鼎臣、趙振祚(?-1860)與邵懿辰(1810-1861)等人，祀於正氣閣，宣揚正氣精神。⁸³其後，梅曾亮特為「正氣閣」撰寫記文，強調忠義正氣亙古常新，無分前明或本朝事例，均堪為典範。⁸⁴與此同時，另有士人別開蹊徑，從經世史學的角度切入，呼應忠義、正氣的時代風潮，魏源在1842年刊刻的《聖武記》即為顯例。魏源希冀藉由纂輯清朝開國武功事蹟，激勵士氣、對抗外夷。⁸⁵1843年，則有顧沅《乾坤正氣詩集》的刊行；1848年，潘錫恩的《乾坤正氣文集》纂輯竣工。除了以勝朝忠義死節之士為主角的《乾坤正氣集》外，咸豐七年(1857)前後，張應昌(1790-1874)纂輯《國朝詩正氣集》，該書以收錄清朝吟詠忠孝節義詩作為主，標舉忠孝節義精神，蒐羅逾萬首詩篇，冀期「振世扶綱常」。可惜因戰亂亡佚，未能一窺全豹。⁸⁶

⁸² 相關討論，請參閱唐屹軒，〈鴉片戰爭的和戰人物品藻與士人網絡〉，《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45期，頁85-89。

⁸³ 宗稷辰，〈道光二十年始以山陰會稽別館為越中忠義祠建閣其上曰正氣閣明年春二月稷辰始集同人春祭為詩紀事是日與祭者陳頌南慶鏞梅伯言曾亮嚴仙舫正基陶查仙際堯朱伯韓琦何子貞紹基孫芝房鼎臣也先約趙伯厚振祚邵味遲懿辰以事不至〉，《躬恥齋詩鈔》，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577冊，頁222-223。

⁸⁴ 梅曾亮，〈正氣閣記〉，收入梅曾亮著、彭國忠、胡曉明校點，《柏枧山房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頁254-255。

⁸⁵ 魏源，〈聖武記敘〉，《聖武記》（道光甲辰年鐫，日本早稻田大學藏），頁1a-2b。有關魏源經世史學的相關討論，可參閱王家儉，〈魏源的史學與經世史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學報》，第21期（臺北，1993.06），頁155-172；齊思和，〈魏源與晚清學風〉、〈晚清史學的發展〉，《中國史探研》（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頁599-684；彭明輝，〈晚清的經世史學〉（臺北：麥田出版，2002），頁113-145。

⁸⁶ 張應昌，〈自題國朝詩正氣集此集稿本亂後已失〉，《聿壽軒詩鈔》，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1517

何以張應昌會有輯刊《國朝詩正氣集》之舉？張應昌，字仲甫，號寄庵，浙江歸安人，其父張師誠(1762-1830)歷任各省按察使、布政使和巡撫等職，政聲卓著，屢獲恩眷。張應昌雖為官宦子弟，然孝行馴謹，毫無貴氣，舉止宛若寒儒。1810年中舉後，任內閣中書，入實錄館負責謄錄嘉慶帝(1760-1820)的實錄，因病致仕歸鄉。張應昌返鄉後以纂輯書籍為主，晚年編有《國朝詩鐸》和《國朝詩正氣集》兩部詩集。早在1807年，林則徐中舉後不久，即進入福建巡撫張師誠的幕府，負責文書工作，深獲賞識。1811年高中進士後，離開張師誠幕府，但仍保持密切連繫，張應昌應是在此機緣下，與林則徐相識，並建立起友好關係。如嘉慶十七年(1812)，林則徐與張應昌同游西湖；道光元(1821)年，再次與許乃谷(1785-1835)、張應昌等人共游西湖名勝；1824年，張應昌贈詩四首，祝賀林則徐四十壽辰。⁸⁷此外，另有1833年〈呈林少穆撫軍時撫吳中〉，1841年〈送林少穆制府謫戍西陲〉，1846年〈喜聞少穆制府自西陲召還朝並奉先署陝督之命次辛丑年公留別核人二律原韻郵賀〉，1850年〈林文忠公輓詞〉等詩作。⁸⁸凡此種種，均可顯見張、林兩人的密切關係。因此，在林則徐的影響下，不難理解為何張應昌會有輯錄《國朝詩正氣集》之舉。

儘管《國朝詩正氣集》已亡佚，但從張應昌纂輯的《國朝詩鐸》或可略窺一二。在《國朝詩鐸》中，張應昌將詩作打散，依據主題內容重新編排，分為26卷，計153項類目，逾2,000餘首詩，藉以呈顯時代風貌，內容多以描寫社會弊病、災荒肆虐、戰火摧殘和生靈塗炭等主題為核心。其中，在「將帥」與「兵卒」的主題中，張應昌即收錄多首詩作，歌頌川楚教亂身先士卒的將領，與在鴉片戰爭中英勇抗敵的死難將士，並表揚默默無聞的兵卒。⁸⁹

冊，頁162。

⁸⁷ 來新夏編著，《林則徐年譜新編》，頁69、101、130。

⁸⁸ 張應昌，〈呈林少穆撫軍時撫吳中〉、〈送林少穆制府謫戍西陲〉、〈喜聞少穆制府自西陲召還朝並奉先署陝督之命次辛丑年公留別核人二律原韻郵賀〉、〈林文忠公輓詞〉，《彝壽軒詩鈔》，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1517冊，頁99-100、122-123、138、148。

⁸⁹ 如：黃承吉，〈明將軍破賊歌教匪擾孝感明將軍亮一鼓破之數年漢陽人誦德不衰歌以美之〉，《國朝詩鐸》，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1627冊，頁583；屠倬，〈張鐵槍歌〉，《國朝詩鐸》，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

透過重整、排比士人詩作，強化忠勇將士奮勇抗夷、以死報國的正氣之風，冀期激勵士氣。

綜上可知，「正氣」的風潮從道光初年伊始即隱隱浮現，透過士人崇祀先賢、修繕祠墓等活動拉開序幕，同時，藉由傳觀具有象徵意涵之人物的書札、遺墨，喚醒士人對忠氣、正氣的記憶。隨著時局轉變，夷敵進犯，不論是為頌揚死節將士撰文賦詩，或營建「正氣閣」祭祀名賢、烈士，直至顧沅、潘錫恩先後兩部《乾坤正氣集》的刊刻，以及張應昌的《國朝詩正氣集》等，甚或藉由經世史學之途，激勵士人忠義之心。凡此種種，皆與林則徐、姚瑩等人的言行，及其形成之網絡連繫密切相關，致使「正氣」風潮成為清中葉時代風貌的一個重要面向。

(二) 召喚滿人的忠義之風

正當漢族士人如火如荼提倡正氣、頌揚死難將士、積極纂修書籍之餘，滿族士人又是如何看待時局變換？如何回應這場纂修書籍風潮呢？以下將選取鐵保、觀成二人為例，嘗試解析滿人的態度及其回應之道。

1. 鐵保與《熙朝雅頌集》

鐵保，棟鄂氏，字冶亭，號梅庵，滿洲正黃旗人。父祖輩多為武將，唯

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1627冊，頁583-584；趙函，〈鐵槍歌贈張永祥〉，《國朝詩鐸》，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1627冊，頁586；孔繼鑠，〈哀舟山三總戎殉節詩辛丑英夷犯舟山總戎王錫朋鄭國鴻葛雲飛同日戰歿詩以哀之用陶詩詠三良韻〉，《國朝詩鐸》，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1627冊，頁586；夏之盛，〈殘兵行辛丑定海之敗〉，《國朝詩鐸》，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1627冊，頁597；薛時雨，〈辦團練〉、〈募鄉勇〉，《國朝詩鐸》，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1627冊，頁600；許楣，〈鄉勇歎〉、〈糧勇歎〉，《國朝詩鐸》，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1627冊，頁600-601；張興烈，〈新樂府悲民團〉，《國朝詩鐸》，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1627冊，頁598；陳春曉，〈鄉勇叛〉，《國朝詩鐸》，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1627冊，頁594-595。

鐵保性好讀書，乾隆卅七年(1772)中進士，授吏部主事，後襲恩騎尉世職。因獲大學士阿桂(1717-1797)賞識，屢蒙薦舉，遷郎中、少詹事、翰林院侍讀學士、內閣學士與禮部侍郎等職。嘉慶四年(1799)因奏劾過當，遭嘉慶帝斥責，左遷內閣學士，後派為盛京兵部、刑部侍郎兼奉天府尹，尋召為吏部侍郎，出任漕運總督。嘉慶七年(1802)調任廣東、山東巡撫。因辦理漕運得宜，獲賞太子太保，然旋因水淺船遲，遭革職留任。1805年擢為兩江總督，又因蘇州知府周鏞和安徽巡撫初彭齡(?-1825)失職，鐵保失察連坐。嘉慶十四年(1809)以河工日壞、吏治日弛，鐵保獲罪遣戍烏魯木齊。逾年獲給三等侍衛，充葉爾羌辦事大臣，尋改授翰林院侍講學士、喀什噶爾參贊大臣、吏部侍郎和禮部尚書等職。1813年伊犁將軍松筠(1754-1835)彈劾鐵保於喀什噶爾參贊大臣期間枉殺回民，嘉慶帝覽奏後大怒，將鐵保褫職發往吉林效力。嘉慶廿三年(1818)召為司經局洗馬。道光初年以疾乞休，1824年病卒。⁹⁰鐵保歷任中央、地方官職，然最為人稱道之處，乃其擅文學、工詩詞且善書法。門人徐端(1751-1812)高聲頌揚鐵保，謂其兼有書家、詩人與經世之材，且其詩文頗具經世思想。吳肅(1755-1821)更云鐵保之詩，「本乎性情之正，兼乎忠孝之全也」。⁹¹

乾隆五十九年(1794)至乾隆六十年(1795)間，乾隆帝諭令紀昀(1724-1805)和鐵保擔任續纂《八旗通志》總裁官。受限體例，《八旗通志·藝文志》僅能臚列相關詩文書目，且多數詩文為鈔本，如未妥善保存，縱使留下書目，亦恐將亡佚。鐵保不願坐視珍貴詩文散失，擬將詩文內容另行彙編成冊，「不負國家振興文教，嘉惠士林」深意。鐵保遂委請朱珪(1731-1806)、紀昀和彭元瑞(1731-1803)等人一同校閱，法式善(1753-1813)、陳希曾(1766-1816)、汪廷珍(1757-1827)、汪滋畹和吳肅等協助編次，蒐羅滿洲、蒙古與漢軍八旗中，名公鉅卿、紳士布衣和閨閣等，計200餘位旗人詩作，編為總集，「仰體聖天子

⁹⁰ 鐵保，《梅庵年譜》，《惟清齋全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147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頁147-181。

⁹¹ 徐端，〈梅庵詩鈔序〉，《惟清齋全集·梅庵詩鈔》，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1476冊，頁271-272；阮元，〈梅庵詩鈔序〉，《惟清齋全集·梅庵詩鈔》，《續修四庫全書》第1476冊，頁272-273；吳肅，〈梅庵詩鈔序〉，《惟清齋全集·梅庵詩鈔》，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1476冊，頁273-274。

教育八旗之恩，鄉前輩貽穀後進之意」。⁹²嘉慶九年(1804)書成後，鐵保進呈御覽，嘉慶帝閱後賜名《熙朝雅頌集》，撰序文嘉許鐵保編纂之功。嘉慶帝盛贊是編收錄詩作，皆有關風俗人心，字裡行間透露忠愛之忱、英靈之氣和勇壯之詞。纂輯旗人詩作非為存其詩文，愛其詩律，而係存其人，「愛其品端心正，勇敢之忱洋溢於楮墨間」。惟嘉慶帝不忘重申：崇文之餘，不可偏廢習武，期勉八旗子弟勿忘父祖開創之艱，效法父祖公忠體國之熱忱。⁹³謝恩疏中，鐵保延續嘉慶帝所論，表達必當遵循肆武習勞之祖訓，並凸顯文以載道的目的，所載之道正是當時旗人欠缺的忠勇節義精神。⁹⁴

嘉慶八年(1803)川楚教亂初告平定，軍事武力、官員吏治與經濟財政等諸多弊病，一一浮現，嘉慶帝對八旗衰弱深表震怒。儘管此前已有輯錄旗人詩文集先例，如康熙年間瑪爾渾(?-1709)輯錄《宸襟集》，文昭(1681-1732)纂輯《宸萼集》，收錄之詩皆為清朝宗室所作。⁹⁵乾隆年間則有卓奇圖《白山詩存》、伊福納《白山詩鈔》，乃較完整收錄旗人詩作之總集。⁹⁶但川楚教亂甫告平定，嘉慶帝面臨八旗軍隊戰力衰退，對頌揚旗人文采的詩集作品不甚以為然。故嘉慶帝著重闡發《熙朝雅頌集》具有激發旗人忠勇節義之氣，文字詞藻與詩文格律則非該書重點。

鐵保身為旗人一分子，且父祖多為武將，對旗人忠勇之氣日漸流失應有所體察。儘管鐵保在原序中，強調是書纂輯係不忍坐視珍貴詩文集散失亡佚，卻也自陳《熙朝雅頌集》係仿效唐代殷璠編選《河嶽英靈集》之遺意。⁹⁷殷璠

⁹² 鐵保，〈選刻八旗詩集序集成賜名熙朝雅頌集〉，《惟清齋全集·梅庵文鈔》，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1476冊，頁231-232。

⁹³ 清仁宗，〈熙朝雅頌集序〉，《御製文初集》，收入故宮博物院編，《清仁宗御製文》(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第1冊，頁47-48。

⁹⁴ 鐵保，〈恭進八旗詩鈔賜名熙朝雅頌集御製序文具摺謝恩疏〉，《惟清齋全集·梅庵文鈔》，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1476冊，頁185-187。

⁹⁵ 相關討論見朱則杰、周于飛，〈瑪爾渾《宸襟集》與文昭《宸萼集》——兩種清朝宗室詩歌總集及其編者考辨〉，《社會科學戰線》，第1期(吉林，2011.01)，頁173-176。

⁹⁶ 相關討論見朱則杰、李美芳，〈卓奇圖《白山詩存》與伊福納《白山詩抄》——兩種早期八旗詩歌總集及其編者考辨〉，《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41卷第3期(浙江，2011.05)，頁91-96。

⁹⁷ 鐵保，〈選刻八旗詩集序集成賜名熙朝雅頌集〉，《惟清齋全集·梅庵文鈔》，收入

於唐開元天寶年間(713-756)選錄 24 家盛唐詩人，共 234 首詩，為當代人輯錄當代詩文的重要先例。殷璠編選《河嶽英靈集》，除讚揚聖朝之美，尚有闡述個人詩文理念與引導詩歌創作方向的目的。殷璠重視的詩文理念可歸納為風骨與興象，強調詩歌文字應蘊含對讀者正面的感染力，反映出明亮、向上，不可阻遏之磅礴氣勢。興象則是文字須揉合情思景物為一，讓讀者閱讀文字後，能有身歷其境的氛圍。⁹⁸故鐵保纂輯《熙朝雅頌集》，或有藉此展現八旗子弟忠義節烈之氣，令時人懷想八旗軍容壯盛之姿。緣此，選錄詩作多強調其鼓吹風雅，根柢忠孝或有盛唐之風等，⁹⁹故論者視《熙朝雅頌集》之編選，實深具政治教化意涵。¹⁰⁰無論宣揚政治教化或激發忠勇節義之氣，鐵保忠實呈顯所選詩作的時代氛圍，並映照出當前最為缺乏的忠勇之氣。鐵保或有仿效殷璠之用意，藉由《熙朝雅頌集》引導詩風，重新喚起旗人忠義之氣。

2. 觀成、鳳瑞、金梁三代人

觀成(約 1790-1843)為瓜爾佳氏，滿洲正白旗，先祖費英東(1564-1620)深受努爾哈赤(1559-1626)重用，受命為五大臣，佐理國事。死後更得配享太廟之殊榮，屢獲追封，順治帝(1638-1661)稱其曰：「開創佐命第一功臣」，康熙帝(1654-1722)則「稱其功冠諸臣，為一代元勳」，奠定瓜爾佳氏在清代的尊崇地位。另一位權傾一時的族人，則是費英東之侄鰲拜(1610-1669)，然因康熙年間結黨專擅，遭革職拘禁，致使費英東後裔退出權力核心，但費英東受封榮銜仍世

《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1476冊，頁231-232。

⁹⁸ 有關殷璠與《河嶽英靈集》的相關研究討論，可參閱王克讓，《河嶽英靈集注》(成都：巴蜀書社，2006)；李珍華、傅璇琮，《河嶽英靈集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2)。

⁹⁹ 如吞珠的詩風被評為：根柢忠孝，準則風騷；博爾都之詩，被評為：暢發心志、載道之言；鄂貌圖之詩被評為：「典雅流麗，有盛唐作者之風」等。參閱鐵保編，《熙朝雅頌集》(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2)，頁167、185、328；周芳，〈茫茫亭內茫茫吟——清初博爾都悼亡詩藝術淺析〉，《滿族研究》，第102期(遼寧，2011)，頁84-88。

¹⁰⁰ 王兵，〈傳統詩教與清廷政教的共謀——以孫毓和鐵保的御敕清詩選本為批評視角〉，《滿族研究》，第3期(瀋陽，2011)，頁108-114。

襲傳承。¹⁰¹

順治二年(1645)，隨著清軍南下攻克杭州，旋即設立杭州駐防城，有滿、蒙、漢軍八旗約三千餘人駐紮在此。康熙七年(1668)，費英東之孫烏巴海輾轉調至杭州，雍正六年(1728)，烏巴海之孫查郎阿從杭州旗營調至乍浦。查郎阿長子圖幹恰納早逝，為延續子嗣，在長媳王依氏的建議下，查郎阿續娶邵氏，並生下觀成。觀成出生後不久，查郎阿病卒，遂由其嫂王依氏、母邵氏撫育長大。1818年，觀成考取浙江鄉試舉人，主考官為王引之(1766-1834)，與龔自珍(1792-1841)、許楣(1797-1870)、徐士芬(1791-1848)等人為同年。¹⁰²其後，赴京參加會試不第，與同鄉龔自珍、戴熙(1801-1860)一起留京擔任私塾教師。1833年，觀成前往四川，歷任璧山、長樂、龍華等地知縣，1834年，轉調為四川南川知縣，成為觀成政治生涯的高峰，任職期間政聲卓著，當地居民甚至為他設立生祠，名為「小關廟」。¹⁰³1842年秋天，觀成致仕返鄉，此前，乍浦正因鴉片戰爭，先後於1840、1842年二度遭英軍攻陷，造成駐防軍民傷亡慘重。觀成家人雖因已遷居乍浦駐防旗營外的地區，倖免於難，但面對遭逢兵燹之厄的乍浦，給予觀成極大打擊。緣此，觀成遂輯刊《道光庚子壬寅乍浦駐防殉難錄》，其首要目的乃緬懷陣亡將士、無辜死難者，進而宣揚旗人忠義之風。其次，則是替死難旗人造冊，以向朝廷申請撫卹。觀成長子麟瑞更在書跋中提醒著：「朝野上下幸勿以和議已成，遂可高枕也」，略可說

¹⁰¹ 有關費英東、鰲拜的傳略，可參閱清高宗敕撰，《八旗滿洲氏族通譜》，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第455冊，頁34-35、37。

¹⁰² 該科榜單見黃安綏編，《國朝兩浙科名錄》（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頁329-332。

¹⁰³ 有關觀成的生平活動，可參閱〈觀成列傳〉，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大清國史人物列傳及史館檔傳包傳稿目錄資料庫」，文獻編號：702002024-0-01；趙爾巽等撰，《清史稿》第45冊，頁13615-13616、第46冊，頁14077-14078；Pamela Kyle Crossley, *Orphan Warriors: Three Manchu Generations and the End of the Qing Worl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77-118 (中譯本：陳兆肆譯，《孤軍：滿人一家三代與清帝國的終結》(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頁89-136)；觀成，〈憶兒時哀詞〉，《語花館詩拾》，收入熊飛輯，《貴和堂三代詩存》，收入徐雁平、張劍主編，《清代家集叢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5）第14冊，頁421-423；同一首詩，收錄於《乍浦集詠》則題為〈憶兒時九解紀欽旌節孝先嫂王依孺人事〉，見沈筠編錄，《乍浦集詠》（道光丙午四月，日本東洋文庫藏），卷11，頁2a-3b。

明親身經歷戰爭的人們，其內心真實感受。¹⁰⁴且如此感受不分滿漢，鴉片戰爭期間適值返回江蘇常熟，乞養母親的翁心存(1791-1862)，亦籠罩在巨大的戰爭壓力下，日記中盡是對英軍侵擾各地、城池陷落、將士捐軀等，感到惶惶不安，甚或情報真偽難辨的焦急心情。¹⁰⁵

咸豐十年(1860)，太平天國忠王李秀成(1823-1864)率軍攻打杭州，觀成三個兒子，麟瑞、鳳瑞、雲瑞，以及麟瑞之子柏梁(1847-1907)均投入這場戰事。而觀成幼子鼎瑞及其侄子文瑞、彬瑞等則負責留守家園。戰爭爆發後，麟瑞、雲瑞奉命堅守南門，然寡不敵眾，在巷戰中受敵圍困，麟瑞遭鎗殺而亡，雲瑞亦不屈而死。而觀成的堂兄觀績、竟成也在這場戰亂中陣亡。鳳瑞返家後，發現鼎瑞、文瑞、彬瑞等皆已自殺身亡。幸存下來的鳳瑞、柏梁自願追隨李鴻章(1823-1901)轉戰江浙一帶，以為家人報仇雪恨。鳳瑞在接下來與太平天國的征戰中，出力甚多，更與李鴻章之弟李鶴章(1825-1880)結為好友。柏梁在軍中以忠勇著稱，深獲李鴻章讚賞，其後因功獲賞花翎，歷任佐領、協領、杭

¹⁰⁴ 觀成，〈道光庚子壬寅乍浦駐防殉難錄序〉，收入金梁輯，《瓜圃叢刊敘錄》，收入國家圖書館編，《國家圖書館藏古籍題跋叢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第26冊，頁66-67；麟瑞，〈乍浦殉難錄跋〉，收入金梁輯，《瓜圃叢刊敘錄》，頁67-68。

¹⁰⁵ 翁心存1840-1842年的日記中對此相關記述所在多有，然此處無法盡舉，僅能列出若干部分，作為參考。如：1840年，戰爭伊始，翁心存述及「人心不靖，風鶴訛傳，余杜門不與官府接，無從探聽確實也。上憂國計，下念民心，內顧身家，傍徨無策，如何如何」；「夜聞人聲沸騰，瞿然驚起……今日薄暮時忽大夷船三只直指福山港口，對炮台而泊，距岸甚近，居人大駭，勢尤岌岌矣」；「是日清晨，城中風鶴喧傳，人情惶惑。薄暮，警備愈急，福山城閉，民皆罷市，紛紛走避，小舟來城外者首尾相接」；1841年，「暎夷盤踞定海八閱月，擄掠奸淫，生靈塗炭，真令人髮指」；「聞逆夷踞香港久，奸宿婦女，梁麻瘋，擊幼孩腦以食，土人憤極，并斃一大頭目，不知確否」；除夕當天記曰「伏處荒江，浙事竟無確耗，即近者乍浦、吳淞數百里內傳來風鶴，真偽亦莫可知，憂之如何，惟有浩嘆」；1842年，「今日龍舟甚盛，傾城往視，紳士高宴西莊，入夜縱觀烟火，城頭人聲沸騰，直不知世間有可憂事也」；「聞城中遷避者愈多，有被劫奪者，人情愈皇駭，城居已半空，益岌岌乎其殆矣。郡垣戒嚴，三鄉設柵，松太兩屬難民紛紛逃竄，真信益少，訛言繁興，列城皆望風披靡」；除夕當日記云「自夏間兵氛告警之後，城中大小戶俱罷散，度歲爆竹聲甚稀矣」。參閱翁心存著、張劍整理，《翁心存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11）第1冊，頁343-421；翁心存著、張劍整理，《翁心存日記》第2冊，頁423-573。

州駐防洋槍隊全營翼長、副都統等職。¹⁰⁶

太平天國平定後，鳳瑞謝絕恩賞，返回乍浦，與官方、地方文人、商人等，一同為重建乍浦、文瀾閣而努力，同時更繼承父親觀成的文化事業，與丁丙(1832-1899)、鮑正言等人，合作重刻因戰火散佚的書籍，逾二千餘種。其中，在鳳瑞主持下，刻印《咸豐庚申辛酉浙江八旗殉難錄》，其目的與觀成纂刻《道光庚子壬寅乍浦駐防殉難錄》相近，係為采輯杭州、乍浦等地旗人殉難忠義故事，並合編為浙江八旗殉難錄。在這場戰亂中，觀成一族也付出慘痛代價，鳳瑞在序中痛陳：此一劫難致使「兄亡家破」，因此，從戎數載，誓殺賊匪，至今仍有「偷顏人世」之憾。¹⁰⁷

觀成、鳳瑞先祖戰功顯赫，故家風強調忠義之氣，更是親身實踐忠勇抗敵、敢為人先的魄力，如麟瑞在對抗太平天國的戰役中，不辱先祖之名，奮戰至死。其後，追諡忠節，祀於昭忠祠。鳳瑞之子金梁(1878-1962)，亦承襲此一家風，曾增補、重印吳慶坻(1848-1924)輯刊之《辛亥殉難記》，在重印的書跋中直言，乃欲效法父、祖刊行《道光庚子壬寅乍浦駐防殉難錄》、《咸豐庚申辛酉浙江八旗殉難錄》，保存杭州駐防官兵於辛亥之變的殉難故事，不使忠烈將士事蹟湮沒不傳，且可廉頑立懦，於人心世道有所裨益。¹⁰⁸略可呈顯觀成一族家風，三代人皆感懷時局，積極編纂殉難錄，藉以標榜、傳續滿州八旗將士的忠義之氣。

除了為抗敵死事的忠義旗人纂輯殉難錄外，觀成更曾編纂《節孝傳》以紀念母親邵氏、兄嫂王依氏，爭取朝廷旌表。為此，觀成更運用其士人網絡，邀請王引之撰寫敘文，並請林則徐、陶澍、戴熙、湯貽汾(1778-1853)、張廷濟(1768-1848)、沈筠(1802-1862)等人題詞。其後，書板毀於太平天國戰亂中，直至光緒初年，鳳瑞再次重刻時，邀請曾國藩(1811-1872)、彭玉麟(1816-1890)、李鴻章、俞樾(1821-1907)、文祥(1818-1876)等，為該書賜詩。¹⁰⁹若將殉難錄與

¹⁰⁶ 有關麟瑞、柏梁父子的事蹟，可參閱趙爾巽等撰，《清史稿》第41冊，頁12592、第45冊，頁13809-13810。

¹⁰⁷ 鳳瑞，〈咸豐庚申辛酉浙江八旗殉難錄序〉，收入金梁輯，《瓜圃叢刊敘錄》，頁68-70。

¹⁰⁸ 金梁，〈重印辛亥殉難記跋〉，收入金梁輯，《瓜圃叢刊敘錄》，頁70-71。

¹⁰⁹ 王引之，〈節孝傳敘〉，收入金梁輯，《瓜圃叢刊敘錄》，頁71-72；金梁，〈節孝

節孝傳合而觀之，一方面顯現出觀成、鳳瑞父子的交遊網絡外，另一方面也可凸顯清朝官方強調八旗子弟忠孝教育的重要性，如嘉慶十三(1808)年，嘉慶帝因目睹宗室族人行為「不自檢束」，干罪獲譴者所在多有，特撰〈宗室訓〉宣示相關規範，訓詞中剴切陳言：八旗子弟係國家棟梁，以「孝弟忠信禮義禮恥」為立身之要，「國語騎射，讀書守分」乃應為之事。¹¹⁰在觀成一族身上，即可得到最佳印證。

從鐵保與觀成、鳳瑞父子的事例略可看出，嘉道之際，正是清朝面臨內憂外患的關鍵時刻，故鐵保、觀成、鳳瑞等旗人，有著更深刻的感受，尤其是觀成、鳳瑞更是親身經歷無情戰火的波及，觀成的兄弟子侄在太平天國戰爭中死傷殆盡，幸存下來的鳳瑞，更有家破人亡之感，故其衝擊不可不謂小。緣此，不論鐵保、或觀成一族，皆係感懷時局，冀期召喚旗人忠義之氣，並保存、宣揚旗人忠勇抗敵故事，故藉由纂輯詩集、殉難錄等著作以達目的。

五、結語

本文從顧沅、潘錫恩與姚瑩等人通力合作，纂輯的兩部《乾坤正氣集》出發，探尋清中葉時代脈動和纂修書籍風潮之間的關連性，冀期回答：什麼樣的作品可以代表嘉道年間的世風？透過本文研究，筆者以為或可將《乾坤正氣集》視為嘉道年間的重要代表，其寓意、主軸即為正氣、忠義之風。

《乾坤正氣集》在清中葉的編纂、刊刻，具有三個重要意義：其一，在逐漸走出高壓禁書的氛圍下，士人開始進行編纂書籍的工作，《乾坤正氣集》的刊刻可謂清中葉纂修書籍風潮的重要代表。兩部《乾坤正氣集》雖由顧沅、潘錫恩各自署名為纂輯者，且一為詩集一為文集，然顧、潘兩人可謂協同編

傳題辭書後》，收入金梁輯，《瓜圃叢刊敘錄》，頁72-74

¹¹⁰ 清仁宗，〈宗室訓〉，《御製文二集》，收入故宮博物院編，《清仁宗御製文》（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第1冊，頁119-121。此外，清仁宗亦賦詩表達對於宗室綱紀漸趨渙散的憂心，詩云：「宗室實繁多，頗覺紀綱紊，深憫罹憲章，特製清漢訓，原期眾共和，賢愚盡思奮，前席宗族延，所答非所問，茫然皆未聞，負予垂示願，親近尚若斯，閒散又奚論，罰既不知懲，教復未能勤，吁嗟如之何，返躬惟自怨」。清仁宗，〈諭宗人府諸王貝勒〉，《御製詩二集》，收入故宮博物院編，《清仁宗御製詩》（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第4冊，頁60。

纂，從各自為對方撰寫之序文中即可略窺端倪。在編纂過程中，顧沅厥功甚偉，諸多珍貴詩文集均來自其家藏或由他訪查而得。然若無姚瑩熱心奔走、居中牽線，以及地方重量級官員潘錫恩的金援支持，兩部《乾坤正氣集》能否順利付梓，或許仍在未定之天。是故，顧、潘、姚三人皆是催生《乾坤正氣集》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此外，大時代背景的發展脈絡亦不可忽略，《乾坤正氣集》除了是時代的產物，在刊行後亦成為形塑清中葉時代風貌的重要助手。同時，林則徐、姚瑩等人均扮演了關鍵角色，他們成為士人網絡中，崇尚忠義、正氣之風的現時且具體代表，從而發揮推波助瀾的效果。而《乾坤正氣集》的纂輯過程及內容，精準契合時代脈動的「正氣」、「忠義」之風，且以勝朝忠義之士的詩文集作為主要收錄範疇，與官方重新定位前明歷史評價的政策略有異曲同工之妙。

其次，《乾坤正氣集》乃時代發展下的產物，同時，也進一步推動時代巨輪的轉動，致使「正氣」、「忠義」之氣成為清中葉重要且關鍵的時代風貌。此前，與「忠義」相關的議題，多半用於講述效忠明代、對抗滿人故事。經過一百多年的沈寂，在清中葉重新登上舞臺，士人賦予「忠義」新的內涵，逐漸轉化為對抗外夷、效忠清朝的意思。但緊接著延伸出來的議題則是：要用什麼案例作為提倡忠義的範本？此時，原本被視為禁忌的明末清初忠義之士，成為最佳的思想資源。當然，這並不代表清中葉已對相關問題全部解禁，而是因為在乾隆年間，已進行過一次總整理，重新定義這些敏感士人在清朝舞臺的位子、排序。因此，清中葉士人方可「借屍還魂」，讓這些明末清初的士人重新粉墨登場，重新詮釋他們的忠義故事。而顧沅、潘錫恩等人更在原有基礎上，偷渡被列為禁書之詩文著述，冀期激勵士習、振起忠義、正氣之風。

再下一個值得思索的問題則是，滿、漢士人對於清中葉「正氣」、「忠義」之時代風貌的態度，有無歧異？滿族士人如觀成、鳳瑞父子均有其親身經歷，故特別強調「忠義」之氣，且多以滿族旗人為例，藉以宣傳效忠清朝之意。正如同嘉慶帝讚許鐵保纂輯《熙朝雅頌集》，便著眼於能喚起旗人忠義之氣。稍後，在太平天國、辛亥鼎革之際皆有相似的情況出現，觀成、鳳瑞、金梁三代人皆致力於輯纂殉難錄，冀期標榜滿族八旗將士的忠義之氣。

直至 1923 年，金梁增補、重印吳慶坻輯刊之《辛亥殉難記》，仍以承襲父祖刊行《道光庚子壬寅乍浦駐防殉難錄》、《咸豐庚申辛酉浙江八旗殉難錄》為念，希望彰顯杭州駐防官兵於辛亥之變的忠烈故事，其主軸仍不脫效忠清朝的「忠義」精神。反觀漢族士人的論述，則多以「正氣」為主軸，講述此乃天地綱常，從古至今的天地正氣。因此，滿、漢雙方自清中葉起皆不約而同大聲倡議忠義、正氣之風，只是隨著時局遞嬗，對抗的對象可以是洋人，也可能轉化成滿人。是故，儘管滿、漢雙方在清中葉之際，皆口徑一致對抗外敵、強調效忠清朝的忠義之舉，但隨著時代轉變，發揚天地正氣與強調忠於清朝的意識，是否會產生衝突？或許值得進一步探究。

其三，整體而言，士人致力於書籍的修纂，特別是針對詩文總集的部分，乃清中葉重要的時代風潮之一，書籍主軸大多緊扣時代脈動，故呈顯出土人眼中的時代風貌。雖然在 1826 年已有《皇朝經世文編》的刊刻，但從士人言論可知，纂修書籍的主流仍以詩文總集為主。正如姚瑩在 1846 年慨嘆缺乏氣節之士，仍訴諸刊行忠孝氣節人物之生平事業與詩文作品，藉以啟發人心。然咸豐以降，受到西風東漸影響，這種回歸傳統思想資源，冀期訴諸詩文著作轉化人心、世風的想法，逐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加入各式西學元素。¹¹¹清末民初之際，編纂大型詩文總集更從原本積極導正士習文風的功用，轉變為追憶舊時代，懷想故國的表徵。¹¹²因此，每部詩文總集的纂輯背後，均有其特殊的時代意義，而編者亦透過不同人物或主題的選取，傳達出特定訊息。是故，每部總集均能反映出一個時代風貌，若能仔細審察，將有助吾人進一步掌握整體時代脈動。

¹¹¹ 有關晚清西風東漸影響的相關研究，可參閱羅志田，《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社會與學術》（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鄒小站，《西學東漸：迎拒與選擇》（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修訂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¹¹² 相關研究討論，可參閱林志宏，《民國乃敵國也：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9）；林志宏，〈舊文物，新認同——《四庫全書》與民國時期的文化政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7期（臺北，2012.09），頁61-99。

徵引書目

Bibliography

(一) 檔案

- 〈禮部知照潘錫恩應予謚立傳咨文〉，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大清國史人物列傳及史館檔傳包傳稿目錄資料庫」，文獻編號：702001204-0-01。
- 〈觀成列傳〉，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大清國史人物列傳及史館檔傳包傳稿目錄資料庫」，文獻編號：702002024-0-01。

(二) 專書與史料

- 《林則徐全集》編輯委員會編，《林則徐全集》第1-10冊，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2002。
- Pamela Kyle Crossley, *Orphan Warriors: Three Manchu Generations and the End of the Qing Worl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 中山大學歷史系中國近代現代史教研組、研究室編，《林則徐集·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62。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朝上諭檔》第1-18冊，北京：檔案出版社，1991。
-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第1-60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
- 孔飛力(Philip A. Kuhn)著、陳兼、陳之宏譯，《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4。
- 方濬師撰、盛冬鈴點校，《蕉軒隨錄·續錄》，北京：中華書局，1995。
- 王汎森，《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7。
- 王汎森，《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3。
- 王克讓，《河嶽英靈集注》，成都：巴蜀書社，2006。
- 王拯，《龍壁山房文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第65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朱琦，《怡志堂詩初編》，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1530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朱維錚校注，《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

- 何冠彪，《生與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擇》，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7。
- 何紹基撰、龍震球、何書置校點，《何紹基詩文集》，長沙：岳麓書社，2008。
- 吳秀之等修、曹允源等纂，《江蘇省吳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
- 李彥章輯，《蘇亭小志》，道光丁酉開雕長洲顧氏藏版，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
- 李珍華、傅璇琮，《河嶽英靈集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2。
- 沈筠編錄，《乍浦集詠》，道光丙午四月，日本東洋文庫藏。
- 來新夏編著，《林則徐年譜新編》，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7。
- 周宗奇，《清代文字獄》，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
- 宗稷辰，《躬恥齋詩鈔》，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第577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岡本さえ，《清代禁書の研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6。
- 林志宏，《民國乃敵國也：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9。
- 林則徐，《雲左山房文鈔》，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第548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金梁輯，《瓜圃叢刊敘錄》，收入國家圖書館編，《國家圖書館藏古籍題跋叢刊》第26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
- 阿英編，《鴉片戰爭文學集》上、下冊，北京：古籍出版社，1957。
- 姚瑩，《東溟文後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151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姚瑩，《東溟外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151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姚瑩，《後湘續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第54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故宮博物院編，《清仁宗御製文》第1-2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
- 故宮博物院編，《清仁宗御製詩》第1-7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
- 孫鼎臣，《孫芝房侍講芻論》，咸豐十年五月刊于武昌節署，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室藏。
- 翁心存著、張劍整理，《翁心存日記》第1-5冊，北京：中華書局，2011。
- 馬雅貞，《刻畫戰勛：清朝帝國武功的文化建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
- 張芾，《張文毅公奏稿》第1-2冊，臺北：成文出版社，1968，台1版。
- 張金鏞，《躬厚堂詩錄》，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第618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張際亮著、王颺校點，《思伯子堂詩文集》上、中、下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2007。
- 張應昌，《國朝詩鐸》，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1627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張應昌，《彝壽軒詩鈔》，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1517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梅曾亮著、彭國忠、胡曉明校點，《柏硯山房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 清高宗敕撰，《八旗滿洲氏族通譜》，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55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符葆森編，《國朝正雅集》，清咸豐六年京師半畝園刊本，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 許械，《東夫山堂詩選》，收入文清閣編，《稀見清人別集百種》第17冊，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
- 郭成康、林鐵鈞，《清朝文字獄》，北京：群眾出版社，1990。
- 陳永明，《從逆寇到民族英雄：清代張煌言形象的轉變》，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7。
- 陳永明，《清代前期的政治認同與歷史書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 陳慶鏞，《籀經堂類藁》，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152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陸以湉撰、崔凡芝點校，《冷廬雜識》，北京：中華書局，1984。
- 陸嵩，《意苕山館詩稿》，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第570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喬治忠，《清朝官方史學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
- 彭明輝，《晚清的經世史學》，臺北：麥田出版，2002。
- 馮桂芬，《顯志堂稿》，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153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黃安綬編，《國朝兩浙科名錄》，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
- 楊國楨編，《林則徐書簡(增訂本)》，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
- 楊鍾義著、雷恩海、姜朝暉校點，《雪橋詩話全編》第1-4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
- 葉高樹，《清朝前期的文化政策》，板橋：稻鄉出版社，2002。
- 葛以簡、葛以敦編，《凌臺府君年譜》，收入北京圖書館編，《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143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
- 董琅輯，《甬東正氣集》，收入王德毅主編，《叢書集成續編》第119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台1版。
- 鄒小站，《西學東漸：迎拒與選擇》，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

- 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修訂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 熊飛輯，《貴和堂三代詩存》，收入徐雁平、張劍主編，《清代家集叢刊》第14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5。
- 趙爾巽等撰，《清史稿》第1-48冊，北京：中華書局，1976-1977。
- 齊思和等整理，《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第1-6冊，北京：中華書局，1964。
- 齊思和，《中國史探研》，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 潘錫恩輯，《乾坤正氣(文集)》第1-40冊，臺北：環球書局，1966。
- 蔣彤編，《李申耆(兆洛)年譜》，臺北：文海出版社，1969。
- 魯一同著、郝潤華編校，《魯通甫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
- 魏源，《聖武記》，道光甲辰年鐫，日本早稻田大學藏。
- 羅志田，《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社會與學術》，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 鐵保編，《熙朝雅頌集》，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2。
- 鐵保，《惟清齋全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147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顧沅輯，《今雨集》，道光己酉秋仲重編藝海樓藏版長洲顧氏開雕，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 顧沅輯，《吳郡文編》第1-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 顧沅輯，《乾坤正氣(詩)集》，道光癸卯秋日長洲顧氏藝海樓雕，國家圖書館藏。
- 顧沅輯，《賜硯堂叢書新編》，道光庚寅秋日長洲顧氏開雕，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
- 顧沅輯，《韓忠武王祠墓志》，收入吳平、張智主編，《中國祠墓志叢刊》第46冊，揚州：廣陵書社，2004。
- 顧沅輯《乾坤正氣(詩)集》，清同治六年新建吳氏皖城刊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
- 顧震濤，《吳門表隱》，上海：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

(三)、論文

- 王兵，〈傳統詩教與清廷政教的共謀——以孫鉉和鐵保的御敕清詩選本為批評視角〉，《滿族研究》，第3期(瀋陽，2011)，頁108-114。
- 王家儉，〈魏源的史學與經世史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學報》，第21期(臺北，1993.06)，頁155-172。
- 有木大輔，〈曹寅の奏摺から見た御定『全唐詩』の成書過程〉，《日本中国学会報》，第58期(東京，2006)，頁188-201。

- 朱則杰、李美芳，〈卓奇圖《白山詩存》與伊福納《白山詩抄》——兩種早期八旗詩歌總集及其編者考辨〉，《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41卷第3期(浙江，2011.05)，頁91-96。
- 朱則杰、周于飛，〈瑪爾渾《宸襟集》與文昭《宸萼集》——兩種清朝宗室詩歌總集及其編者考辨〉，《社會科學戰線》，第1期(吉林，2011.01)，頁173-176。
- 何冠彪，〈清高宗對南明歷史地位的處理〉，《新史學》，第7卷第1期(臺北，1996.03)，頁1-27。
- 何冠彪，〈順治朝《明史》編纂考〉，《大陸雜誌》，第99卷第2期(臺北，1999.08)，頁1-22。
- 佚名，〈近四十年世風之變態〉，《國民日報匯編》，收入張枬、王忍之主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一卷下冊(北京：三聯書店，1960)，頁740-744。
- 李鵬程，〈晚清「經世文編」現象研究〉，《中州學刊》，第151期(河南，2006.01)，頁182-185。
- 沈豔，〈近代「經世文編」賡續潮流述論〉，《史學月刊》，第3期(河南，2004)，頁108-115。
- 沈豔，〈晚清經世文編的文化特色與文化本質〉，《清史研究》，第1期(北京，2000)，頁69-74。
- 沈豔，〈晚清經世文編現象的歷史文化透視〉，《江漢論壇》，第1期(湖北，2000)，頁58-62。
- 沈豔，〈晚清獨特的文化景觀——經世文編的相與賡續〉，《孔孟學報》，第78期(臺北，2000.09)，頁321-344。
- 沈豔，〈試論近代續「經世文編」文化熱潮的成因〉，《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2卷第4期(湖北，2005.07)，頁489-492。
- 周芳，〈茫茫亭內茫茫吟——清初博爾都悼亡詩藝術淺析〉，《滿族研究》，第102期(遼寧，2011)，頁84-88。
- 林存陽，〈《史籍考》編纂始末辨析〉，《故宮博物院院刊》，第1期(北京，2006)，頁135-150。
- 林志宏，〈舊文物，新認同——《四庫全書》與民國時期的文化政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7期(臺北，2012.09)，頁61-99。
- 林曉光，〈明清所編總集造成的漢魏六朝文本變異——拼接插入的處理手法及其方法論省思〉，《漢學研究》，第34卷第1期(臺北，2016.03)，頁309-355。
- 唐屹軒，〈鴉片戰爭的和戰人物品藻與士人網絡〉，《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45期(臺北，2016.05)，頁61-108。
- 陸林，〈清代文言小說家潘綸恩生卒定考〉，《明清小說研究》，第4期(南京，2002)，

頁177-179。

喬治忠，〈論清順治朝與康熙朝初期對《明史》的纂修——兼與香港大學何冠彪博士商榷〉，《河北學刊》，第23卷第3期(河北，2003.05)，頁145-151。

黃克武，〈《皇朝經世文編》學術、治體部分思想之分析〉，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5。

劉苑如，〈從品鑑到借鑑——葉德輝輯刻《山公啟事》與閱讀〉，《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38期(臺北，2011.03)，頁171-213。

劉廣京、周啟榮，〈《皇朝經世文編》關於經世之學的理论〉，收入劉廣京，《經世思想與新興企業》(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0)，頁77-186。

顧其威，〈顧沅編刻紀年表——為紀念顧沅誕辰二百周年而作〉，收入傳統文化研究會編，《傳統文化研究》，第7輯(蘇州：古吳軒出版社，1999)，頁343-348。

龔來國，〈清「經世文編」研究——以編纂學為中心〉，上海：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04。

(四)、網路資料

孫燮著，小成標點，〈藝海樓藏書記〉，收入蘇州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蘇州史志資料選輯第二十三輯》，

(http://www.dfzb.suzhou.gov.cn/database_books_detail.aspx?bid=3675)，2018年5月12日檢閱。

潘祥鶴，〈明代萬曆首輔大臣張居正，清代光緒軍機大臣張之萬〉，《江蘇潘氏宗親網》，(<http://www.jspans.com/Catalog/719/2976>)，2018年7月21日檢閱。

***The Collection of Righteousness (Qiankun Zhengqi Ji)*
and the Movement of Books Editing in the Mid-Qing Period**

Tang, Yi-Hsuan

Assistant Professor, Fundamental Education Center,

National Chin-Y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Emperors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paid great attention to cultural establishments. Before the Qing power expanded into China proper in 1644, emperors already initiated plans to publish books actively. After 1644, they set up more book-editing plans to cover literature, historiography, geography, dictionary and encyclopedia. These books contained complex political and cultural thoughts and brought great influence. Although official book-editing decreased during the Jiaqing-Daoguang period, except the Emperor Record and Emperor's Poetry Collection, literati continued to edit books actively under literary persecution and their efforts turned into a movement. The Jiaqing-Daoguang period marked a turning point in Qing dynasty. How did literati act during this period? How did they transform academic work into statecraft? These are questions that existing scholarship has not fully answered. To answer these questions, this article will examine the two versions of *The Collection of Righteousness (Qiankun Zhengqi Ji)* edited subsequently by Gu Yuan and Pan Xi-en and explore the major concerns, network of scholars, and other issues of the book-editing movement in mid-Qing period. It aims to further understand the academic culture of the Qing Dynasty, identify the trend of the times, and delineate the

intertwined relationship between academic works and political change.

Keywords: *The Collection of Righteousness (Qiankun Zhengqi Ji)*, Mid-Qing Period, Gu Yuan, Pan Xi-en, Book-Editing

